

D095.1



200128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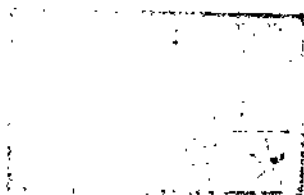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DG74/14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美]马·拉科夫斯基著

钟长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Marc Rakovski
TOWARDS AN EAST EUROPEAN
MARXISM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78

根据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Dongou de Makesizhuyi

〔美〕马·拉科夫斯基著

钟长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94,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3002·262 定价 0.76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一、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1
二、回顾“市场社会主义”	13
哪些人关心经济改革?	16
改革者的思想	20
改革者的失败	25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稳定	31
三、知识分子	37
哪些知识分子?	41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特征	47
“低级知识分子”	58
地下刊物	62
各种倾向	70
四、两个体系在运转	74
经济组织	79
阶级结构	85
结果	88
技术的发展	93
消费结构	95
经济周期	98
阶级斗争	101

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弯路	108
行政机构的马克思主义	110
列宁主义	114
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	119
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圣典化	128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136
地下马克思主义对抗官方马克思主义	140

一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彼此不相往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在令人不安地涌现出来,但是在对待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关键问题上,它们的态度还是相当一致的,因此我们仍可以称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承认:资本主义是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它必定被消灭;在历史上战胜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使命,而且是其社会结构的基本阶级之一即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任务是要将其自身的知识能力提供给培养工人阶级明确其客观利益的实际锻炼过程。

但在对待另一个大的世界体系,即东欧各国和苏联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中的各种流派却达不成这种最起码的一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各个苏联模式的社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一模式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剥削机制上的;还有一些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东欧的工人阶级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但是政权却被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官僚阶层剥夺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期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为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打下经济基础;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模式的发展只不过是步资本主义积累下经济与技术结构的后尘,

因此它只能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他们中间某些人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为达到更高级的平等开辟了道路；另一些人则认为，劳动按技术分工所固有的等级差别必然会重新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不平等。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模式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它是市场经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有人会强调废除市场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而其反对者则硬说，没有市场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争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也同样是完全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接受目前那些苏联模式的社会，而另外有许多人则希望发生根本性的改革或爆发一场社会革命。某些人期望看到由政治领导人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些人则期望出现由工人阶级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还有些人则寄希望于经济与技术专家。

但是，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当西方那些在主要问题上持不同见解的倾向实际上日益增长的同时，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似乎在逐渐消失。围绕苏联模式的社会展开的争论，已越来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之争。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难以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联系，那么在现今的东欧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很难找到了。在那里，你只有在大学里才能找到一批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员，以及少数处于地下状态的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起过桥梁作用的大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

当然，人们只好从苏联模式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结构中去寻求答案。可是再现其历史结构并不等于作出了充分的解释。其实，各种恶劣的社会条件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他们的信念。但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就连那些少数决心逆流而进的人也深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确是事实；这些人接受过对苏联模式的社会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和评价，但在新形势下，他们对这些概念却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只消把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社会所作的各种解释在概念上加以条理化，就能较好地理解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困难。所有这些理论方面的解释，包括最矫揉造作的复杂解释，都可以归结为下述三种看法，即把苏联模式的社会看作社会主义社会，或者看作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因素组成的过渡性社会，或者看作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种看法认为，东欧各国的社会结构取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它产生两个最重要的结果，即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能够就整个社会来计划和组织生产。前者意味着更平等地分配收入，更好地统管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和享有真正的文化民主；后者意味着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更合理地决定社会应优先考虑的问题和更好地满足集体的需要。这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的设计本应成为东欧各国和西方共产党的官方思想，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但官方意识却比这走得更远。由于这种设想还很不具体，因此为了使爱挑剔的知识分子同路人能接受它，就任意地添加一些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在这一设想中添加进苏维埃俄国最初的不发达状况和强制推行工业化

的历史必要性,从而得出结论说,斯大林主义是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可以用最高政治阶层产生“缺陷”和违反“列宁主义准则”之类的解释来补充这个问题,从而使问题转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何况,人们只需要把这个问题归咎于非斯大林化过程所遇到的困难,就可以使这个问题甚至同那种明确谴责“悲剧性错误”(例如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对格但斯克的大屠杀,或者对苏联国内知识分子异端运动的镇压)的势头协调起来。

第二种看法也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它构成了苏联模式发展的社会主义因素。然而,国家不仅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总利益,而且代表官僚们的特殊利益,即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特权以及他们的显赫地位。为了维护这些特权,使其免受其他社会集团(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干预,官僚阶层试图控制全部权力,不让公众染指。然而,对生产资料支配权的集体垄断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为了使政府人员的特权成为不可剥夺的和可以继承的权力,必须把国家财产转变为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因而,苏联模式的国家具有二重性:由于它保证了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它正在把社会引向社会主义;又由于它逐渐脱离了工人阶级并为官僚们垄断所有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而又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种矛盾不会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社会主义胜利,就是资本主义胜利;官僚们的政治统治不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治所代替,就是被资产阶级企业家的阶级统治所代替。

这种过渡性社会模式是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一方面，它的某些内容具有重大的深远影响。例如，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在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界中，对托洛茨基批判官僚政治的一些主要论点产生了共鸣；但是，只有正统的托洛茨基分子才全部接受了这个概念。另一方面，现今的许多理论见解都是参照它而形成的。例如，在东欧各国实行经济改革的高潮中，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倾向于认为，这些正在进行的改革反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

第三种看法并不完全否认两个体系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某些差异。西欧和东欧毕竟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才达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既然形成时期不同而给已经形成的体制留下了某些标记，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然而，结构上的差异并没有大到使我们能够确认这二者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形态。在各个重要方面，两个体系的表现都是相同的。例如，两个体系中，都是由完成积累的具体情况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目标的命运；两个体系中，消费的模式和技术专家体制是相同的；劳动分工中贯串着同样的等级原则；专家政治正在逐渐掌握经济实权，等等。这第三种看法是六十年代末的产物，而最早出现在从传统左派分离出来的西方新左派中。

几十年来，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按照第一种看法看待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任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该制度的基本结构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斯大林主义时期，他们甚至

连想都不可能想到摆脱已经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自主的、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在非斯大林化时期才在东欧出现的。就在当时，也不存在创立一个脱离官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旨在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主义”残余，从而重新创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适合于这个社会体系的思想。当然，在对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谴责了政治上的、有时是制度上的“缺陷”。但是，这个时期的非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抱怨过，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只有官方思想的词汇才是社会主义的。恰恰相反，他们提出批评的前提是，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正因为如此，它同政治上的独裁主义、同极端教条主义地忽视群众的需要，或以受控制的宣传来取代文化等现象是势不两立的。

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出现权力之争的时候，也存在一个有利条件，即这个时期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从同样的理论前提出发开展辩论的。这正是非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对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结果施加某些影响的原因，尽管这还不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那种影响。但是，当斯大林之后的制度得到巩固，统治阶级实现了新的团结时，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就很快消失了。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集团真正愿意听取对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的公开批评。那些真诚地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并敦促领导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已遭到厌弃。当局以压制言论回答了批评，那些过去企图充当政府真正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屈服于这种压制，就是很快转入了地下。

这就是对东欧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解释。显然，这是一场只有从理论上根本改弦易辙才能完全克服的危机。只要我们仍然从苏联模式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前提出发，我们所能唯一做到的事就是等待统治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再度提出需要我们效劳。

但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过渡性社会”理论往往是既批评得不中肯，又作些肤浅的辩解。一方面，它预告了国家官僚们会变成资本主义的股东。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预言似乎不会实现，它又补充这样一种意见，即尽管官僚主义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在生产资料和经济积累方面所实行的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托洛茨基主义中，这种辩解性的陪衬手法更加明显，因为它对苏联模式的财产关系、工艺发展、劳动分工和消费方式提不出别的取代方案。这种既批判又辩解的暧昧态度，对西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许很有用处，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并生活在严格划分为两部分的冷战世界中，因而既不愿被人看成是支持斯大林主义的，也不愿被人看成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对于在斯大林之后的时期中企图确立知识分子自主地位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只能把问题弄得更糟。

至于“过渡性社会”理论的其他说法也都无济于事。因为其大前提的基本构成就是错误的，其具体细节也就全都是错误的了。人们不可能既把苏联模式的社会看作过渡性社会，又在它的各种阶级关系中推导出一条没有矛盾的道路。只有当社会的各个机构分属于几个对抗性的权力中心，而这些权

力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一些公认的合法机构来调整，而是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公开的斗争时，这样的社会才叫做过渡性社会。只看到集中统一的计划和其他类似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同时存在，就把苏联模式的社会列为过渡性社会，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证实两点，这两点我认为，第一是要体现出生产者的经济权力，第二是要体现出管理者的经济权力，而这两者之间从长远来看又是不可能调节到一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俄在二十年代倒真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国家机器已把俄国城市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而在农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当时乡村掌握在由小自耕农组成的农民村社手中，而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组织却得不到承认。这两种体制要长期并存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但是，当国家机器通过农业集体化把它的政权扩大到了农村，并通过强制性工业化为这一政权建立了经济基础，苏俄的阶级关系和劳动分工就在一个能够自己进行再生产的一元化体制中一体化了。在东欧各国变成了人们所称的“人民民主国家”之后，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国家。

第三种看法确实避免了“过渡性社会”理论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一般说来，有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相似之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两个体系之间相类似的地方更加明显了：两种社会在消费方式的构成和日常生活的环境方面，其相似之处越来越显著，两者的技术专家体制也没有明显的实质性差别；而且苏联模式的社会在劳动分工方面的等级制结构还未曾解体。尽管人们可以觉察到两种类型的社会，在消费方式的构成、技术专家体制和

等级制的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着具体差别，但其本身相似之处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其他方面，例如按就业情况的周期性变化和特点来说，不同之处比类似之处更为明显，但人们对这些共同点的深刻印象并没有被冲淡。可是两种制度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方面越是相似，就越是难以避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是在两个制度的一个制度中，工人阶级才能对生活状况施加有组织的影响？为什么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才有工人运动（不管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还是革命的）？毫无疑问，这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来说，都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设法脱离了统治阶级，也同样会遇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概念上对两种社会制度不作任何区别的理论，远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将其束之高阁。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只满足于对当代的一些异化征兆列出一纸清单，他们一定会充分利用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不加区别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文明进行一般性的批判，它还立旨于其他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醉心于“文化悲观主义”的东欧人为什么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探寻他们可以直接从公开的保守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的思想中，能够得到的思想。而在东欧的地下组织中，这些思想是很盛行的，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更受欢迎。马克思主义如果要保持它做为一种批判社会的理论的特点，并以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话，它就不能置两个社会制度在组织体制和阶级结构上的差异于不顾。

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社会 的 阐

述，并没有能够使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官方的意识形态决裂。新左翼的阐述也无助于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去克服阻止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其天然阶级基础之间的联系的一些特殊障碍。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在东欧存在下去，它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崭新的理论基础上面。我提出一种假设，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即苏联模式的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混合体。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社会，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的一个不同类型的阶级社会。

可是，一旦人们这样提出问题，很明显，困难不仅在于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了探讨我们上面刚刚提出的第四种假设，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传统结构重新进行探讨。在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中，不可能对一个现代的非过渡性的社会作出解释。在那里虽然不存在私有财产，但生产资料也不是由生产者集体支配；虽然没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但是仍把人们划分为阶级；虽然在正常情况下经济优先项目并非由市场决定，但也不是由联合的生产者通过合理讨论来作出抉择，等等。

当然，正如马克思完全知道的那样，他所称为的“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都和上面提到的、现代的非过渡性社会的情况一样。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当代意义的私有财产和阶级结构，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产生由主观和客观生产因素组成的市场。但是，马克思越是强调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内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历史性，他的历史主义就越加明显地局限于一般性的对比。马克思只知道一种非资本主

义的当代的发展形式,即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与在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总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在财产、阶级、市场等范畴内会产生一个新的结构,而认为它们会彻底消失。

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关键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知道在资本主义形成以前有许多独立的发展道路。例如他说,在古老的印度和中国,部落社会被“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代替;在地中海四围的欧洲,被“古老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被“日尔曼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出现时,这种多方面的发展(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开始急剧地朝着一个方向会聚。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使得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瓦解了,并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就马克思面言,资本主义在发展规模上所表现出来的总的优越性,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并没有简单地淘汰其他所有的阶级社会,而是使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达到顶峰。由于在经济上摆脱了社会的非经济机构,于是一个纯经济的阶级结构便从血缘关系、封建制度、宗教组织和行会等等的复合体中产生了出来;从各种各样个体的和集体的所有制中产生了私有制;从性别、年龄、社会等级和阶层之间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中产生了劳动技术分工;从以相互之间的个人服务网和各种类型的法律义务等为立足点的市场中产生了以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机制为立足点的市场。虽然经济依然处于社会的非经济关系的范围之内,它的分类却以许多历史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旦经济脱离了社会的非经济机构,这些早期的形式就不能继续发展,只能有一种纯经济的阶级

和所有制形式，只有一种技术劳动分工，只有一种自动调节的市场。因此，社会要取得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必须废除这些早期的形式。

尽管历史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也无法避免分阶段发展的进化论过于简单化的影响，这种进化论支配着马克思时代的社会科学。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最终他得出的结论与当时的进化人类学和编史工作的结论是十分相似的。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是一位分阶段发展的进化论者。这种看法后来支配着共产国际的官方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二十年代，在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分阶段发展的进化论加以对照，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发生了争论。他们的路线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仍有影响。但是，对于居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总是满足于指出马克思有历史主义的思想，满足于把这些思想同后来的各种庸俗化加以对比，而不去涉及马克思历史观的内在矛盾。这样，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关于传统社会的立场，但是人们永远不可能割断马克思主义同分阶段发展的进化论的根深蒂固的关系。因此，人们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加进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是一个同资本主义并存的特殊的阶级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结构中，不存在一种沿着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社会制度，它也不仅仅是沿着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早期阶段或晚期阶段。

二 回顾“市场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各个苏联模式的社会在经济体制方面发生的一些历史性转折，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它们的改革经历了若干曲折的道路。一些小国只要不遭到一些仍坚持斯大林主义行政计划制度的大国的反对，看来就已经朝着一种市场制度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就其长期过程来考察，而不是只看到其某个政治危机时刻，那么上面谈到的改革的道路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由于这些改革不十分激进，而保守势力也不够强大，所以仍能明显看出这些国家在改革方面十分明显的总的趋势，尽管这些国家在发展道路与速度上有所不同。但这种倾向却是普遍存在的，即由于心血来潮面搞的瞎指挥逐渐被普遍设置的固定管理人员所代替，烦琐的指示换成了更为简单的指标；实物性计划已让位给财政性计划；而在保持经济平衡方面，政治动员也让位给正规的协调机构，等等。

在改革中发生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也同样表现了出来。遇到关键时刻，在那些实行广泛深入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的国家里，“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在那些保守的国家里，则开动它们的全部宣传机器来加以反对，但是，在思想领域内这种长期并存的局面也相当明显。尽

管“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在各国尚未组合成为自成体系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间，即从斯大林体制开始瓦解到斯大林之后的体制最终确立这段期间，这些主要思想在东欧各国都已充分表现出来。各国都有许多人支持下述说法，即市场是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性的中性工具（它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社会）；通过市场分配资源比采取行政手段更行之有效；把生产资料的分配权集中在中央手里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独裁，而权力分散则促进政治民主。最迟到六十年代末期，“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各国遭到了彻底失败。但是，它的失败只是减小了一种总的趋势的摇摆幅度，而丝毫没有改变这种趋势本身。

但另一方面，“市场社会主义”的衰落的确是件划时代的大事。“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全盛时期，正值这样一个时代的末期，那时对献身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说，使苏联模式的社会得到发展比这些国家已实际经历过的历史更为重要。按“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的实际上的、并且是所期望的经济改革，看来似乎接近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模式在各方面都比集中的计划经济更为优越，并且是所有社会主义运动所遵循的样板。但是，自从斯大林之后的政权得到巩固以来，便很难想象那些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为立足点的思想能够提出类似这样的主张。当“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顶峰时，东欧的经济改革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争论，这决非偶然。但是，自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衰败以后，东欧的经济体制沿着大致相同方向进行的改革，却几乎没有引起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兴趣。

从纯理论的观点来看，应把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进展看成一件好事情，因为事实上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只是阻碍了对真正要求实现这一思想的客观过程的理解。这场辩论的中心问题（“社会主义允许市场存在吗？”“没有市场行吗？”）同经济改革的实际没有多大关系。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理论来说，这些问题却极为重要，而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问题后来简直被人所遗忘也决非好事。但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的解释没有再受辩论上述问题的干扰，则是一个明显有利的条件。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社会本身进行的考察从未取得成功。客观地认识东欧经验的企图总是和这样的问题混淆起来，即这些国家的经验对那些已经成功或失败、或仍将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现在终于很自然地把苏联模式的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看成只不过是一种现代阶级社会，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在这一章中，打算暂且不谈“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而只把“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看作某一个特定社会集团的意识。因此要谈的问题是：这个集团是些什么人组成的，他们为什么力图通过重建市场机制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何以遭到失败。

哪些人关心经济改革？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试图说明，同这种思想有联系的改革是根据普遍的经济原理，而不是在某个社会集团施加的压

力下进行的。然而，就连最极端的新自由派对市场的颂扬，也不能使我们完全忘记这样的事实，即这样的改革不仅提出了各种经济制度都固有的普遍的执行能力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权力问题。不管各个苏联模式的社会实行的改革多么温和，多么有节制，它们都提出了重新调整各级管理机构的决定权问题。即使所有其他改革使所有的社会集团都同样受到了影响，但这次却不同，它使某些社会集团将比其他社会集团得到更多的好处，就是说通过改革将扩大他们的权力，提高他们的威信。这些受益多的集团显然不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政治权贵，因为按照改革前的制度，他们握有全部权力。这些受益多的集团也不包括那些统治阶级以外的集团，因为任何一个改革纲领，不管它多么大胆，都不会设想要把即使是一部分经济权力交给那些过去完全处于作出决策和为决策作准备的圈子以外的集团。只是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长远的目的而支持改革的人才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分享经济权力。因此，那些支持“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力量势必处于这样两极之间的地位：他们看来是统治阶级中的这样一部分人——从企业一级的决策者到仍在政治权贵之外的中央一级的经济决策人。

上面提出的界限之所以如此模糊，是有原因的。那部分从改革中受益的统治阶级的成分十分复杂，它们是由许多集团组成的，它们的情况是难以搞清楚的。其中大多数集团的情况只有从它们在经济等级制结构中所处的相对地位才能加以判明。唯一例外的一个集团是，其成员一般被称为“专家”的集团。不管这些专家在经济等级制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他

们是以自己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只靠在等级制结构中玩弄私人关系而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判断他们的主要标准，当然是他们的业务能力，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驯从则是次要的。正是这些专家不只一次地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要以“科学”的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标准来选人。

专家能达到政治权贵的地位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尽管这种机会甚至也向级别较低的经济管理人员开放。实行市场制度使专家们可以指望明显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实行由经济调节的市场制度，要求企业对周围发生的变化比由中央管理的经济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更加敏感，作出的反应也更加精确。因此，经济决策中政治方面的例行公事的作用下降了，而专业知识的作用则加强了。因此，在各级机构中，专家是最坚决地支持改革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低级的经济决策人，如生产性和服务性企业的经理，也支持“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市场机制可以使他们的作用不再降低到单纯地执行那些多变而又很烦琐的任务；他们也不必每次都要等待中央经济管理部门下达当前的生产任务，相反却能够完成大量的一直是由他们来解决的、一般性的经济任务。他们将可以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而且必须利用这些资本赚取一定数额的利润。由他们来决定如何使用现有资本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这只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在改革的实践中，这种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甚至在改革的思想中也没有反映出这种理想，而只是影影绰绰地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是，这幅理想的图画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企业的经理同中央管理机器的各个部门和职能机构打交道时的特殊处境。

对于中央管理机器的各个部门和职能机构来说，保证企业的经营有利可图同它们的任务并不直接相干。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向国民经济提供必要的商品，保证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宏观平衡，遏制物价上涨的趋势，保障充分就业和重点部门的迅速发展，等等。根据中央当局的利益来执行这些任务永远束缚着企业，使其不能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个别企业可以通过改革生产结构，使其更趋合理化而受益。但是，负责全面工作的主管部长则可能由于上述企业进行改革而失去他由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满足来自各方面的要求而得到的战略地位。有的企业可能发现，关闭它的一个工厂，然后把资金转移到国内其他地方会有利可图。但是，当地的市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将不得不遇到许多新问题。还有的企业可能通过把平均工资增加一倍而使生产率提高两倍。但这样一来，那些无力提高工资的企业将对劳动当局施加巨大的压力，等等。

我们不难理解，如果只是由上述矛盾来决定经济改革的全过程，那么较低级的经济管理人员将会不断地遭受到来自整个等级制结构全面施加的压力，并且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自主权。然而，在管理的等级制度结构的更高级的部门中也出现了上述的矛盾。实行市场制度不仅使企业的经理们减少了对中央机构的依赖，而且还可以指望在中央各级机构中，重新调整那些尚待分配的管理权。例如，在一个理想的市场模式中，那些所谓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财政部）的权力，通过削弱其他部门的权力会得到明显的加强。某些机构的权限将扩大，而另一些机构将丧失某些对企业活动的管理权，但是，它

们失去的这部分权力又将从其相应地减少对上级机构的依赖中得到补偿。按照不同国家和实行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对重新调整管理权有利害关系的管理机关的整个组成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中、高级经济管理集团，将是改革的实际支持者。在中央机构中也总是可以找到改革的支持者。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从行使权力的角度对主张和支持改革管理体制的各种力量进行了考察。现在 we 再从个人消费的角度看看实行经济改革有哪些优越性。就是在旧制度下，在等级制结构中，级别的提高意味着货币收入的显著增加；但是，由于消费品供应长期匮乏和服务业极不发达，这种收入本身并不能产生同行使权力的级别相应的特权。因而为了满足统治阶级中高级阶层的需要，单独制定了一套分配消费品的制度。实行这个制度不是按照商品流通的原则，而是按照实物分配的原则。甚至有些花钱可以买到的产品，也不是作为一般商品出售。要买件东西不仅要有足够的货币，而且进入销售这些东西的商店就是一种少数人才有的特权。扩大消费品的生产，为那些在过去享受不到这些特权的统治者阶层开创了一种新局面。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再加上相伴而来的物质刺激制度，使他们的货币收入急剧增加。商品越丰富，供应的种类越多，就越使得他们在特权、消费品和生活方式方面赶上权贵，专家们在这方面得到的利益最显著。相比之下，专家更被排斥在特权分配制度之外，而同时他们又最热衷于追求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消费方式。

改革者的思想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改革的纲领要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寻找依据，至少在其全盛时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进行思考，就会认识到，我们恰恰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伴随着改革纲领的是一种旨在用市场自动调节来取代经济管理中的官僚主义网络这样一种思想；但是，纲领本身却从未提出这么远大的目标。

当人们研究改革的实际方案时（假设这些方案是主张实行市场机制的），就可以看出其中提出了许多建议，如：由中央规定的企业税额不应超过企业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应使情况类似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条件之下；由中央规定的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应限制在政治上所必需的最低额；经济决策人的收入应根据他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效率而定；应该制定出更大的工资级差，等等。这些建议能否实现就要看中央当局起用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人员来引导企业实现这些总目标，而中央当局又是实现这些总目标的有代表性的机构。只要设想的这些改革能使中央机构的烦琐的、靠不住的管理方式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些改革在实际上就减少了企业负责人对中央管理机构的依赖。但是，这还仅仅是改革管理体制内部的依赖关系，这些改革甚至没有触及这种依赖关系的主要机构的基础结构。即使那些最大胆的改革纲领也没有对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产生怀疑，依照这种经济制度，由中央当局任免

和奖惩企业负责人,就是说,依照这种向国民经济提供商品,保障充分就业等等的苏联模式的等级制经济制度,中央当局可以支配国家预算,通过银行系统操纵金融信贷,利用党和工会组织控制政治舆论并协调各种利益。

不管管理机构如何分权,不破坏苏联模式的经济等级制度,企业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向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的市场结构的转变,不管中央当局是否放弃向企业负责人下达特别指示的权力,它们总是要保留施加压力的合法权力的。它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迫使企业负责人放弃根据市场准则进行预测,而确定最有利的经济战略。中央当局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这样做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是,它们要对多次丧失获得利润机会的顺从的企业给予补偿:如果中央机构要最大限度地从市场得到好处的愿望和它所考虑的重点经常发生冲突,这些企业不需要对市场的需求作出反应就会有条不紊地改善自己的状况。

从上而谈到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在改革者的思想和改革的实际纲领之间是有距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立即放弃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的假设,即认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改革的纲领中把改革的比较激进的意图隐藏起来了。如果支持改革的人真的很注意不把他们的纲领的细节泄漏出去的话,那么对他们在宣布改革的最终目标时表现出的那种粗心和坦率,又该作何解释呢?说改革纲领是慎重的又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改革的纲领同“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比较,它是胆怯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同统治阶级所能容忍的限度加以比较,无疑它又太大胆了。

支持改革的社会势力，对实行市场类型的自动调节机制的、在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公开加以考虑，阻止他们这样做的那些实际因素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希望实行市场机制，但并不希望摆脱制度上的依赖关系（它阻止市场对协调经济活动的控制）。他们希望实行市场机制，是因为他们想享有同老的政治权贵所享有的平等权力，赶上他们的个人消费水平。但他们又不希望这种制度上的依赖关系破裂，因为尽管这些关系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同时又保护了他们。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高于企业一级的经济管理人员对实行市场制度在心理上是矛盾的，对此无需进一步加以阐明。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在较低级的管理机构中也存在同样的矛盾心理。那些有自主权的企业能够放开手脚地做成许多笔惊人的大宗生意，而那些直接依赖中央管理机构的企业则办不到。但是，它们对生产不佳则负有较小的责任。国家作为老板随时都会援助那些陷于困境，然而却顺从的企业负责人，豁免他们的税款，向他们提供新的信贷和优惠价格，等等。由于国家给各个企业放手经营的权力，有些企业可以因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工艺和规模等情况，获得远远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而另外一些企业则不得不减产、发生亏损或被迫进行调整。按照现行制度，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会采取限制前者的发展和扶植后者免于倒闭，以及把物资从一个企业调到另一个企业的办法来维持处于不平等状况下的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平衡。因而预计会发生下述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即那些对进行市场竞争有充分准备的企业负责人，为了摆脱这种依赖关系将施加强大的压力，而那些对竞争不适应的企业负责人将

竭力阻止这一进程（在那些真正实行改革的地方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在企业的经济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中所存在的一种非经济成分，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了。不再受中央当局保护的企业负责人，不仅面临着发生亏损的可能，而且还面临着工人的反抗骤然加剧的可能。对此，中央机构履行双重职能。它对企业领导人对工人的剥削，规定了一个极限。它还进行干预以保障就业和工资的稳定，以至逐步增加工资。但是，当工人提出的要求超过了这个最低限度时，中央机构也对企业领导人给予保护。它有办法削弱工人为了扩大他们的利益所作的努力；而且当经过各种努力，一个企业中发生的冲突还是激化了时，它有能力迅速地粉碎工人进行的有组织的反抗，也同样能够迅速地满足一些最紧迫的要求。

高于企业一级的等级制结构实质上在单独执行发展与平衡经济的功能，负责保持政治舆论的一致和协调各种利益。如果这种等级制结构瓦解了并丧失了权威，工人们将获得建立并巩固他们的反抗组织、协调他们之间的行动的机会。这只是一假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工人有能力把自己组织起来，其他所有的社会集团都有能力这样做。但是，各个集团在有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上没有共同的利益。例如，那些组成统治阶级的集团，凭借他们在社会分工的等级制结构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掌握了一部分权力。而有些社会集团仍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这种权力等级制结构依然存在的话）。前者在有机会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将会有所得，在为后者创造机会，使后者也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的过

程中，又将会有所失，得失相比，将得不偿失。如果这些中、下级经济管理人員和他们周围的专家把自己组织了起来，同政治权貴相比，他们的地位或许能够得到一点改善，但他们将输给工人阶级更多的东西。为了防止他们手下的工人摆脱他们，他们宁愿屈从于中央管理机构也不愿打破把他们束缚于中央管理机构的依赖关系。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这样的—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互相对立的各个社会集团为了做到在经济和政治冲突中扩大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拥有相互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手段。他们想要的是，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中取得一个较好的地位，依据这种体制，相互冲突的集团可以通过采取向中央机构施加压力的手段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一切。

在已经制度化了的依赖关系面前，各种改革纲领渐渐地销声匿迹了，这一事实表明，那些支持改革的社会势力远远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只不过是隶属于老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已。他们试图在老的阶级统治中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改善，并且不代表新的阶级统治。这一结论和东欧社会进行的经济改革的长期趋势完全一致。然而，对在短期内背离这种长期趋势的现象应如何解释呢？现在这个问题颠倒过来了。既然是这样，需要加以说明的，不是支持改革的社会势力提出的实际纲领温和的问题，而是他们思想上存在的激进主义的问题。既然支持改革的人并不准备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实现市场机制的条件，他们为什么又如此强烈地要求实行市场机制呢？

改革者的失败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兴旺和衰落大约经历了十五个年头，这段历史时期就是从斯大林主义政权向斯大林主义之后的政权过渡的时期。

在经济领域，斯大林主义意味着不惜任何代价地进行积累，为此，实际上把全部剩余产品都集中起来，使整个社会生活都服从于这个目标。积累任务的完成，使得消费、空闲时间和私人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长期处于不平衡和受压抑的状况。为实现一切为了积累这个总动员的目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实行恐怖政策。如把一些日常的微不足道的活动，都从意识形态高度，象征性地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联系起来，而这种象征性的意识形态则把任何异端行动都看成是反抗和阴谋破坏活动，从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这种行动。这就使得政治权贵对所有的社会集团和阶层都可以行使无限的权力。

尽管斯大林推行的积累政策造成了苏联经济的长期不平衡状态，但它在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工业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的。不过，恰恰是所取得的这个成功使得苏联经济越来越容易出现不平衡。实行恐怖政策，虽然便于从农业得到工业需要的社会剩余产品，或便于遏制个人消费，但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消除思想上的背离或追捕所谓的阶级敌人来解决已经是相当复杂的工业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状态。抵制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是，统治阶级下属的任何集团

都不能安然置身于自发产生的恐怖机制之外。对此，就连统治阶级本身也不得不逐渐地承认这个事实。

当然，要终止上面提到的恐怖机制是困难的。因为，这种恐怖机制一旦终止了，以前的整个经济组织就成了问题。人们也不再能够通过对整个经济进行恐怖的动员和以制造另外的不平衡为代价来解决已经出现的最危险的不平衡问题了。一旦减轻对私人生活施加的恐怖的压力，就无法拒绝关于增加实际收入的要求。还会出现对消费品的实际需求的问题，这就需要更巧妙、更细致的方法来平衡经济。因此就要求经济更具有适应性，要求规定经济决策的不同级别，要求在较低级的单位中使商品能更自由地流通，现金能更自由地周转，情报能更自由地交流。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的终止，自然会提出必须对经济制度实行改革的要求。

实际上，在实行改革的初期，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很谨慎的。在一段时间内把改革只限于慎重地精简管理机构，以及不太大幅度地削减指标。经过长期激烈的辩论之后，才同意苏联模式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价值规律”办事。要想使价值规律在“更大的领域”内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因此，开始时首批进行的改革，无论是与当时必须加以改革的那些领域所需要的范围还是速度都是不相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斯大林化的初期，与其说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占有支配地位，不如说改变一些老的作法更占有支配地位，如当局曾多次试图使用法令手段达到戏剧性地把拨给重工业的社会资源拨给轻工业，把用来生产生产物资的社会资源，用来生产消费品的目的。

在实行改革的初期，由于对经济决策权重新进行调整而可能产生的新的权力集团，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斗争的一个动因。只有大规模的恐怖活动一旦停止了，那部分掌权的政治权贵，由于威信扫地不得不下台的时候，才会出现权力问题。然而，仅是上面谈到的这一点就已经造成了令人极为震惊的事件，如上述过程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中，造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状态，从而给群众提供了由于对贫困和压制不满而发泄愤懑的机会。

如果我们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残余势力撇开一边不谈，那么对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只有两种人拥护，即已经分裂为敌对派别的政治权贵和“人民”。统治阶级中低于权贵的那些阶层被吸收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了；经济改革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到使他们能够向社会提出一项符合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总的选择。

军队制止了由于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引起的危机的发展，这样也就过早地扼杀了任何一种改革思想的产生。但是，这种状况没有长期延续下去。实行大规模恐怖的制度并没有得到恢复，因而通过采取政治动员的手段来克服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这样一些老的方法再也不灵了。不能再有意识地忽视对消费的需求。采取由行政当局改善生产结构的方法，既不能够充分保证源源不断地向经济提供商品，也不能够充分保证提高消费水平。由于原料供不应求，不是生产工业的发展就是消费工业的发展不时地遇到阻碍，这种状况迫使中央当局将所有能够用的资源或者调拨给生产资料工业或者调拨给消费品工业。这种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出现的紧张状况越

来越说明需要实行改革。实际上，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踌躇之后，从那时起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改革运动一直在顺利地进行。同一时期还开始了权力地位的转移，中、下级经济管理人员和围绕着他们的“专家”变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权力因素。

一九五六年，在那些斯大林主义的声名狼藉的代表人物已经下台的国家中，改革以相对连续的方式进行。统治阶级中的权贵学会了把维护自己的特权同复辟斯大林主义的各种企图区分开来，而那些新的正在崛起的阶层则学会把他们提出的经济纲领的政治含意隐蔽起来。他们双方所持的慎重态度大大地减少了爆发突然性危机的可能性。在那些主张改革的势力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政治权贵又没有恢复元气的国家中，要求对经济实行分散管理的倾向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通过改革可以带来比较丰富的、品种繁多的消费品，可以减少政治上的强制就业的现象，还可以带来业余时间内服务质量的改善。很明显，这一切意味着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广大群众看来，领导人阻止改革的任何企图，也就是复辟斯大林主义的企图。统治阶级中正在崛起的集团提出的纲领普遍地得到了拥护，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舆论在召唤他们出来取代盘踞在党的最高机构的政治权贵，由他们来管理整个社会。他们的这些想法是一种幻想，这也正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幻想。

事实不能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总算比没有一个实际的纲领，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能适应建立市场经济的愿望要好些。然而，尽管“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仍是一种空想，它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時候能够变成一种重要的现实力量，并在实际上对社会的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对那些正在崛起的统治阶级集团来说，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诱使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些国家中的政治权贵的合法继承人，在那里，权贵仍代表老的斯大林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市场社会主义”显得最有进取心，这并非偶然。因为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不同于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危机和波兰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改变政治权贵的企图和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的企图齐头并进，而这两个过程又是互相促进的。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终止了改革运动的发展，并向整个东欧宣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但是，军事干涉并不是造成“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唯一原因。主张改革的人失去了他们在六十年代初所能依靠的群众的支持，这至少也是导致“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同样重要的因素。说来也怪，对东欧政治进程进行的军事干涉向东欧各国人民表明，他们不再受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威胁了。在这次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极其残酷的干涉事件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恢复对日常生活的动员或把消费水平降低到最低水平的企图。因此，改革运动的失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欢迎，主要是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工人阶级的消费要求一旦得到满足，它的态度就不再反映经济改革和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工人阶级看来，在提高生活水平中出现的各种差别是同管理体制中取消集中化相联系的。无疑，在改革当中，经济和技术专家以及中下级管理人员是主要的受益者。

在过去二十年中，整个统治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人阶级

的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的差别并非绝对地扩大了。谁要是企图在比较上述二者之间在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的绝对差别，肯定会陷入歧途。如果说过去那些条件差的阶层的生活水平很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话，后来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大大地提高了，这时再同权贵的生活状况作纯数量上的比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况且，在斯大林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权贵的生活水平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别，仅从数量上讲也比改革以后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中下级管理人员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别要大。但是，更明显的是，那些曾经支持过改革的阶层的生活水平更高，这一点非常显眼，甚至连一般群众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所说的社会集团比原来的权贵要庞大得多。恰恰是这个社会集团直接对工人阶级行使权力，至少它的部分成员同工人经常保持着接触。这个集团所需要的生活消费品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从一般市场上买来的，他们购买的商品，原则上工人也买得到。只是工人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这些商品罢了。更严重的是，这个集团不是象老的权贵那样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消费这些商品，他们至少是部分地当着一般群众的面来消费这些商品的，颇有几分炫耀的味道。

统治阶级中的权贵利用这些变化，公开进行反攻。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的保护者，他们反对那些力图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自肥的阶层。被攻击的集团没有进行任何象样的反抗，甚至在那些相对来说改革取得长足进展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些受到攻击的集团也知道，它们不是反对政治权贵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而相反正是它们自己需要权贵保护它们不受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伤害。因此，

它们承认政治权贵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们已经放弃了激进的思想，现在它们所要求的就是改善它们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属集团的地位。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稳定

不只是政治权贵的反攻造成了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失败。工人阶级同中下级经济管理人员之间发生的冲突也使得统治阶级真正恢复了他们的团结，在实行改革的过渡时期，他们的团结曾经受到了震动。那些低于政治权贵的统治阶级阶层逐渐认识到，维护中央机构的等级制统治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好处。最高层领导人不允许他们把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压低到特定的危机极限以下。但最高层领导人保证逐步提高他们本身的工资和就业的稳定。与此同时，中央机构通过宣称它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来为自己辩护，它阻止工人由于对中下级管理人员向他们施加的压力不满而进行的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如果企业领导人有了经济自主权，那么原则上就有可能发生有组织的反对权力机构的经济斗争。相反，如果企业领导人拥有的那部分权力从属于统一的政治经济机构（只有它控制着经济的发展，政治舆论的一致和特殊利益的协调）所拥有的权力，则任何反对企业领导人的行动都被假定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并将招致国家镇压机构的干涉。

使得统治阶级恢复了他们的团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本身变得均匀化了。由被控制的特权制度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减弱了，甚至对于政治权贵来

说也是如此。商店里出售的肉已经对一般群众敞开供应；就连国家提供的配有司机的高级轿车与私人小汽车相比也有其不便之处。权贵（他们的现金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开始追求从市场上可以得到的“西方”商品和服务。被控制的特权制度开始逐渐消亡。在组成权贵的所有集团中，没有一个集团感到，要通过恢复斯大林主义以重新建立特权制度，从而彻底扭转消费方式的新趋势是轻而易举的事。正式规定的特权是造成革命以后和战后年代出现的普遍贫困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体人民不得不把这种特权看作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予以接受。当初制定这种特权制度的目的是，使权贵可以从当时库存的破旧消费品中提取最小数量的物品供他们使用，否则他们就无法行使管理职能。后来，这个制度变得越来越适应权贵的不断增长的要求，当然还赶不上不断增加的市场的差异和活力。

如果中下级管理人员对同权贵决裂不感兴趣，那么权贵对恢复斯大林主义也就不会感兴趣。但是，还必须从其他方面去探索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域。无论是在工人阶级的消费结构方面，还是在工人阶级消费的经济功能方面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斯大林主义的经济管理之下，工人的消费只是一个简单地由行政实行供应的问题，就是说必须从用于积累的总数中扣除当年的社会产品的一部分。扣除的这部分越少，经济增长就越快。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状况是，工人阶级消费水平的均衡提高是构成经济平衡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低于设想的数字，那么广大的经济部门就不能按照原来的愿望继续进行生产。

这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减慢和使就业的困难日益加剧。想在群众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上打主意不仅会引起人民的不满，而且还会导致经济体制的瓦解。

然而，一旦日益增长的群众的消费被纳入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来，经济决策权的分散化也就部分地成为不可逆转的了。一旦群众的消费和经济决策权的分散化在物质指标方面脱离由中央作决定的制度，并且不按行政所提出的供应消费品的分配额去做，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再恢复这个制度。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是典型，这两个国家结合建立比较容易控制的大托拉斯，比较谨慎地简化了下达行政指令的体制。类似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则是一种例外，甚至现在它还强制实行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积累的政策，反对所有微观经济的合理准则。

没有一个东欧国家在改革的任何一个阶段，中央当局只是单独把利润指标作为成功指数。近年来，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中，由中央当局确定的指数变得更加复杂了，但是，这种倒退还没有达到恢复物质指数中的详细生产计划的程度。我们必须预计到，群众消费的增长对经济管理体制形成的压力，从长远看将对管理体制的分散化给予新的推动。群众的消费要求变得多种多样了，更是经常变化的，这就缩短了社会可以接受的使生产适合于群众消费要求的时限，为了满足群众的消费要求，必须把决策权不断地下放给生产和服务企业的经理人员，使得他们能够更自由地和更迅速地跟上需求的变化。当每个人都清楚，中下级经济管理人员不会利用他们得到加强的地位，对现存的依赖体制进行正而攻击时，管理体制的分

散化将更容易取得进展。

如果苏联模式的社会进一步发生危机的话，这未必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原因。在我们对已经巩固了的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看法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使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的相对地位最终发生的任何变化将再次提出权力的问题。如果统治阶级还会发生新的分化，那将是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发生危机的原因。

对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体制根本不能适应的被统治阶级，难道他们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吗？难道只有通过发生严重危机才有可能适应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体制吗？我们仍处在上述这种发展的早期阶段。正在发生的变化既没有显露出它们的范围有多大，也没有显露出它们彼此汇合和相互扩大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已经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是巨大的，有时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政治上出现的最确定无疑的现象是，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不断地发生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工人阶级处境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但是，要说明这些变化则比较困难。

低级经济管理人员从“市场社会主义”没有得到他们可望得到的东西，工人们同样也没有得到。但是，他们从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发展中并不是没有得到好处。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尽管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东欧的工人家庭里开始拥有西方消费社会中众所周知的物品（包括家庭小汽车），尽管这些东西的工艺水平还比不上西方的水平，款式比较陈旧，供应也不充足。无疑上述过程将使东欧各国出现消费社会中所存在的消极现象：生活的内容变得只是追求物质

产品，加班加点和兼职。

一度曾有人说过，把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看作是贫困的、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的如实翻版是极其错误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可以作如下两种选择：不是个人消费的增长超过了任何适度的界限，就是对生活和劳动条件进行集体控制。这两种选择是真正的选择，而不是简单的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对抗。西方工人阶级是有组织的，即使这仍然是明显的事实，如果他们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把他们与之对抗的机构变成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础。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社会活动是由一系列机构来协调和控制的，它使得人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把自己组织起来，工人的反抗只能限于个人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积累个人资产并不是另外的抉择，而是达到个人自主这种唯一可以设想的自主形式的一种手段。拥有某些个人资产的工人在抵抗他的上司或经受由于变动工作（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而造成的暂时经济损失时，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对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一代工人来说，上述这些有利条件表现得尤为明显。对那些拥有强有力的家庭作后盾的青年工人来说，在选择各种工作和技能时，甚至在有工作和暂时没有工作时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因为家庭预算比较宽裕，青年工人的工资对维持家庭生计已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

上面提到的这种变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们丝毫没有把握能看到在非亚特、雷诺和通用汽车工厂生产线上工作的青年工人会起来造反这类事。但是，确定无疑的是，东欧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产生一种新情况。这种

新情况将加剧对苏联模式的社会的制度的压力，并将向其提出许多怎样与之适应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已经经过考验和检验的答案。

三 知识分子

对西方左翼来说，赞成还是反对在苏联进行的实验，通常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道德问题，有时甚至涉及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果赞成它，那就不仅是对历史作出评判，而且要对其所犯的罪恶承担责任。当然，反对它的人，也要承担同样的责任。这种情况造成的悲剧在于这样一种必然性：人们不可能回避作出选择。看起来（或者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任何试图依靠更高一层的考虑来回避作出选择的人，在他们这样做时，归根结蒂也是在进行一种选择，不过没有勇气正视这种选择的后果罢了。

世界确实是两分的，意识方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是单方面的问题。在过去，苏联所发生的事把道德上的责任强加给左翼知识分子，然而，他们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对那些被卷入历史事件的个人的命运负责。对西方左翼来说，历次恐怖审讯的道德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让那些受到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共产党人听任命运的摆布。一些试图为受指控者做点事情的人，面临的决不是这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否则，撇开表示个人声援的问题不谈，他们早就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或者只不过是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试图拯救他们

在苏联的同伙们的生命；或者是有名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持明显的亲苏态度而处于能够设法帮助某个作家或科学家的有利地位。

今天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尽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决定选择社会主义而又摒弃苏联经验，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已不再是道德上进退两难的问题了。然而，声援那些遭到镇压的受害者却向当代的西方左翼提出了严重的良心问题。任何一个以社会主义名义反对苏联的人，都不能使自己局限于仅仅保卫某些个人或集团。这种人不愿两种制度共存的局面长期保持下去，也不必顾虑同苏联合作。他所需要的是从历史上废弃这种苏联模式的社会。那么，他便不能回避道德上的责任，那就是有义务去声援冒着失去自由，有时甚至是失去生命危险，为争取实现这个历史目标而斗争的任何人。

然而，西方左翼中还没有一种倾向能够无保留地指出，俄国的文化和政治地下组织中有那一种倾向是与自己一致的。俄国民族救世论的反西方、反文化的词藻太容易使人回忆起古老的欧洲保守主义，以致吸引不了这些尽管对俄国浪漫派的文化批评确实抱有同情的西方知识分子。那些乞灵于纯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准则”的反对派，只是等待着从上面实行社会改革，这又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难以接受他们。那些号召恢复人类道德的人，把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同蔑视顽固不化的“集团人”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本身处于反对欧洲左翼民主传统的地位。最后，那些沉湎于天真地颂扬西方自由主义优越性的人势必反对所有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抱有的一切信念——不管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

使西方左翼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最合乎自然的办法，看来是支持这些地下组织的英勇姿态，同时又批判它们的政治内容。这是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因为不管他们认为这种属于某一特定姿态的意识形态如何难以接受，这种姿态本身却自然而然地博得西方左派真诚的敬佩。其原因是，在西方要做到使实际生活同激进思想统一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在那里，激进思想本身已变成商品，生产这种商品能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而且根本不担什么风险。而东欧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确实是激进的话）的命运就不会是这样。

西方正在形成一种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崇拜，类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对民粹派恐怖主义的崇拜。但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把思想同个人命运统一起来的方式时认为，暗杀沙皇、大公和警务大臣们的刺客们所树立的榜样更加容易理解。恐怖主义者是采取行动而不是思考他们行动的意义。在那时，俄国同西欧毕竟距离遥远，因此西方的知识分子毋须单纯地考虑这些恐怖行动所代表的抽象的行为方式。然而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来说，行动就是思考本身；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的行动，就是通过自言自语提出要求，让广大群众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英雄崇拜中不知不觉地以辩护口吻提出如下一些托词：苏联知识分子苦于不了解情况，尤其是不了解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他们对官方宣传的谎言只能作出我们虽不赞成但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应，等等，等等。

只有把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摆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打破这种偶像化和家长式的谅解之间的

恶性循环。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用来解释东欧各国发生的事件而提出的一套概念，却未能抓住要害。那些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是某种社会主义的人，或许能够解释产生国内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原因。而那些将苏联模式的社会视为过渡性社会，即视为既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混合体的人，也能够解释产生复辟运动的原因。但是，七十年代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属于上述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同斯大林逝世以后十年当中的反对派相比，已不再谴责制度的“缺陷”，而是谴责制度本身。还有，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甚至其中由于完全陷于绝境而从反动的乌托邦中寻求安慰的那部分人，也并不是以前统治阶级的代表了。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论或者过渡性社会论的理论中，都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西方最近出现了第三种假设，而且还是一种相当流行的理论：苏联模式的社会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制度化的一种尝试，因而带有这种历史经验的标记，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体。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反对派和西方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

对此，通常还有另一种所谓解释：东欧，特别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是孤立的知识分子运动，它同受资本主义结构再生产影响的广大社会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这更多地是一种指责，如果要使它成为站得住脚的“解释”，那么对它本身还须作进一步阐述。就在这一点上，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用来解释东欧各国所发生的事件而正式提出的那套概念（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结构的特征一般化了）便根本不

能成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仅仅是在两个主要阶级控制的战场上的一群乌合之众；知识分子在社会冲突中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是分属于这两极。苏联模式的社会是由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成分构成的，因此显然不能把它的统治阶级说成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阶级结构又总是受到一种制度的制约的，而这个制度的性质则阻挠各社会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防止这些阶级把自己视为一个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的特殊阶级，防止它们成立专门的组织来促进自己的利益。

人们可能会问，苏联知识分子为什么同工人阶级没有建立联系。然而这个问题却提得并不中肯。事实上应当针对苏联模式的社会状况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形成为独立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创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甚至创立它自己的对抗文化和雏形的对抗机构，而那些主要阶级却不能甚至在这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各自形成为一个以实体而存在的阶级？

哪些知识分子？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就不能回避哪些知识分子的问题。如果我们为了简洁起见而接受研究苏联问题的学术专家和苏联的官方社会学者在他们从事调研时所使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其结果将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他们的定义是以职业训练的标准为立足点的，根据从实际经历中得来的材料给知识分子下定义是不难的：一个人，只要他有大学

或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凭，他就算是知识分子。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知识分子逐渐地被结合进权势阶层，而持不同政见只不过是偏离了正常行为而已。

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限定为一个较小的集团，其成员从事智力劳动，而不参加管理和组织工作，那么我们就离题太远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位即使长期不了解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的文学教师，显然也算是一位知识分子；对于一位按常规行医而不关心医学科学进步的医生来说，也算是知识分子。上面给知识分子下的这个定义，一方面把那些被日益结合进权势阶层的人排除出“知识分子”的行列，另一方面，从我们在本段开头时提出的观点来看，这个定义又没有把知识分子限定为一个特定的集团，正如根据这种下定义的方式，也无法把熟练工人限定为一个特定集团一样。

有能力形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社会集团是脑力劳动者的分集团，其成员经常接触文化的和科学的创作过程。“经常接触”并非就是“创作”。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创作者”本身（“创作者”这个词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含义也很不明确），然而，知识分子必须积极地进行有关科学研究和创造文化价值的个人和书面的交流活动。在科学和文化范围内，这种已经制度化了的交流活动形成了公开的领域，对那些参加这种交流活动的人来说，它有效地代替了政治讨论和组织。

众所周知，不仅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而且在资本主义的西方，科学和文化团体的自治已经变成了虚幻的东西了。在知识分子中，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占绝对大多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有同他们职业活动没有联系的收

入来源,或者如果他有的话,他出卖的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他的劳动成果。象古典式大学那样的传统组织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雇主;雇员在完成一定的最低任务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由的了。当时专门化和等级制度化比现在差远了;除了传统的等级差别和人们心甘情愿地表示顺从外,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自由交往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组织上的等级制度化也还没有形成。但是,到本世纪中叶,严格说来,甚至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内,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变成少数了。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这一过程甚至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加剧烈。私人收入和非官方组织提供的资助,作为收入的来源实际上已经被堵死了。脑力劳动的组织已经从属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等级制结构,比它们的西方同行丧失了更多的自治权。科学和文化产品的市场也从属于中央行政管理机构。

上述的到本世纪中叶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趋向于限制知识分子,使其没有能力成为舆论制造者,更谈不上成为自治的意识形态的源泉了。脑力劳动的文化基础的转移,加剧了上面提到的变化,就是说,在牺牲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文化的情况下,专门化了的、科学文化的相对重要性提高了。在从事调研的动机方面,较少考虑社会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知识面很窄,只不过是印证和工具式地运用已经提出来的理论而已。仍然供一般公众“直接消费”的那部分智力生产正在减少,而“生产性消费”的那部分智力生产,即智力生产中的积累部分却在增长。甚至在脑力劳动的领域内也存在一个越来越专门化的问题,脑力劳动的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所采用。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这些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因

为把研究工作象工厂那样地组织起来所造成的后果，由于行政当局对讨论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问题的干预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因而，甚至那些严肃的研究人员也转入研究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中性的题目，即使脑力劳动的分工和组织本身并没有阻挠他们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思考。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考察这些极其不利的情况，就会越来越认识到，甚至在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并由行政所控制的文化和科学生活的结构内部，知识分子的各种集团仍有能力形成并保持相对来说高度的社会集团意识。在一般的公共领域和学术研究之间，不管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在学术界内进行最低限度的公开交流仍是促进学识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官僚政治的控制可能严格到足以阻止整个学科分支的发展，但是，一个致力于工业发展和军事竞赛的现代社会，苏联模式的社会无疑就是这样的社会，经不起同时阻挠所有科学的发展。如果对提供给比较广泛的公众的文化产品的审查极其严格，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机构在学术界同一般公众之间设置的正式障碍。在不干扰对全国民众进行官僚政治的控制的情况下，苏联模式的社会可以在学术界内部保持相对自由的情报交流，这有利于促使形成专业方面的一致意见。所有东欧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把这类学术交流的相当大的部分当作国家机密，即使从军事和工业谍报观点来看，这些交流并不会给安全带来什么危险。甚至在所设置的这些正式障碍当中官僚政治控制的程度也不同，例如，对面向广大读者的智力产品的审查就比对学术性质的出版物的审查严格得多。尽管这些研究机构等级森严，它们至少在原则上必须在学术的公开领域

内,保证参加科学辩论的人的平等。此外,它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学者之间的例行关系让步,哪怕这些关系突破了它们本身的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例如定期举行的专业讨论会,围绕一些学术界名流所形成的各个学派,等等)。

在为广大群众直接消费的文化生产的领域内也出现了与上面提到的同样迹象,虽然程度较轻,而且被修饰了一番。没有特定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民族文学就不存在了。一本书的主题是以争论或批评的口气批评另一本书的主题,接着就会有一篇文学评论批评上述二本书的主题;另一篇(可能是针对第三篇作品的)评论,则隐晦地或论战式地涉及第一篇评论,等等。文学生活是以个人之间进行的经常交流为先决条件的,尽管这种交流不需要象学术界的交流那么制度化——学术界的交流也可以通过松散的友谊而得到维持。按严格意义来说的、意识形态的各种表达方面甚至也是如此。意识形态的表达经不起绝对的重复。即使政治新闻也是如此。相互呼应和相互关联的密切关系抵抗着各种摧毁它们的企图。当然,统治者为了消除那些他们不希望出现的差距,能够逐渐扩大禁区的范围。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降低群众对任何正在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的接受能力。当独立的政治见解遭到镇压时,美学价值的判断,抽象的哲学问题和社会理论问题,以及对远古历史的评价就都有了政治意义。不断扩大禁区非但起不到镇压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作用,反而经常起反作用,并导致政治分歧的明朗化,因为竟在驯服和屈从的作家中“发现”了偏向。

当然,用含糊其词的寓言式的比喻或间接地做出一些隐

喻来反映自己的思想，同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形成的不同立场之间的公开对抗是两码事。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如果同社会的几个基本阶级相比，就连这种有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方式也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权。当然，基本阶级意识到了它们的阶级特性。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基本阶级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阶级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特性。原因很简单，区分各个阶级的界限与在包括一切的社会组织中对人的基本区分很显然是一致的，就是把人分为可以控制他人活动的人和不能行使这种控制的人（知识分子对于这样来划分社会结构，特别是他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共同的意识，不如基本阶级那样明确，他们对待上述的、有意识地把人分为两个基本阶级的态度也比较模糊）。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基本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没有超过原始的、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水平。由于这种原始的划分方法起不到区分的作用，就决定了它只能用来确定在工作场所和生活区里有关集团在彼此的利益关系中所表现的社会行为，在那里是根据人们的典型活动和衣着等物质标志来决定谁属于“我们”，谁属于“他们”的。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除了很快被镇压下去的群众性暴乱这种极罕见的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以上所谈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实际结果的空洞的说教罢了。各阶级为了达到团结和广泛的合作的目的，为了实现全面的社会纲领，它们需要建立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阶级，甚至统治阶级，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虽然这并非说，这个统治阶级不比受其统治的阶级具有更强的内聚力。但是，知识分子同各个基本阶级相

比，则处于一种特权地位。由于在人文学和科学中从事脑力劳动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知识分子，即使没有独立的政治组织，至少也有一个与之相当的职能机构。比较广泛的学术交流（它当然超过了一些主要集团进行的交流）使知识分子能在现政权的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做出许多暗示，并经常可以搞清楚这些暗示所指的真正含义，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对知识分子来说，就相当于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形态。因而，就出现一种在西方看来往往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局残酷地破坏一种直接从内容来看完全无害的、通过文化或科学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却又不顾迫害而一再顽强地涌现出来。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特征

尽管基本阶级的意识仍停留在反映原始的“我们和他们”的水平上，科学和文化生产的总的体制赋予知识分子以形成一种相对来说高水平的共同意识的力量。但是，仅仅这种体制的存在本身还说明不了比这更多的问题。例如，它就没有说明下面的事实，即科学和文化的不断生产过程产生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拒绝利用官方为他们保留的交流渠道，而试图创立其特点是“对抗官方领域”的思想。从事智力生产的这些一般性条件也没有说明给持不同政见者以生存空间的一种分支文化出现的原因。这两种非常明确、历史上极容易加以确定的现象是六十年代后半叶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时期，甚至连从事智力生产的最基

本条件几乎都不具备。在肉体上和思想上实行的双重恐怖连自然科学也不放过。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把最细微的个人行为同社会发展的最广泛的目标象征性地连系了起来，它就把任何与其要求不符的表现说成似乎是反对最终目标，是在政治上犯了罪，而对其作出的反应就是进行恐怖镇压。就这样，专家对技术潜力的判断，甚至自然科学本身的客观性，也都遭受嫌疑。由于仍然认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没有让恐怖机构彻底破坏从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相对自治。没有一门学科，由于它不能满足那些无法实现的要求而没有受到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的干扰的。一群吹嘘引用恩格斯的话就可以创造奇迹的、冒充内行的骗子，控制了农艺学，乃至生物学的大部分领域。数理逻辑和控制论被贬斥为资产阶级的假科学；现代理论物理学之所以能够幸免，只是因为它在军事上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在传统的社会科学中，有些学科由于不太适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其发展遭到了人为的阻挠；而象历史那样一些对于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有用的学科，则使它从一种研究科目，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到斯大林时代的末期，经济学除了作为行政管理，会计学技术的点缀，以及作为教授政治课程的教材以外，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学则根本不可能形成。

在有关意识形态的出版领域内的活动是比较多的，至少从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次数，出席音乐会和展览会的人数等等这些总产量的粗略指标来看是如此。这方面知识分子的工作量不大。意识形态的控制机构避开那些变化无常、靠不住的事情，只允许一种极其粗糙的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出了

一批又一批，数量相当大，但选择的余地很小，生产这类作品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数有限的阶层，他们是按法人团体组织起来的，并享有很多的特权。

另一方面，统治当局也允许存在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多样化，因为这样做对于偶尔举行的排斥邪说的“辟邪礼”来说是必要的。在强制实行工业化所引起的大震动下，往往被迫改变过去的“路线”；这种变动之频繁，就如同苏联的国际处境不稳定需要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方面的次数一样多。然而这个制度的连续性决定了需要保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虚构，说现在的政策是唯一体现了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相一致的路线。解决这种不协调现象最常用的方法是，使官方政策看上去仿佛根本就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在前一个时期被一个“背离分子”集团搞得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样做时，只需要从随时备用的、多种规格的货架上挑选一个最容易被宣布为背离分子的人，抛出来作为虚构的、官方政策连续性的祭坛上的替罪羊。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集团能考虑创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区别于统治阶级中特权阶层强加的意识形态。允许独立思想存在的限度并不比给予文化和科学界的专家们的限度宽。官方的理论家们往往只是规定“总路线”，而将其应用于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则是专家们的任务。这就为专家们，在他们的特定的领域内，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然而却是真正的、对最高政权当局提出的指导原则进行解释的机会。在斯大林主义的最黑暗的年代里，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力图捍卫他们的文化和科学的价值，当时他们只

能限于使用这种十分隐晦的策略。他们无条件地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总口号，在他们把这些口号运用于他们自己的特定领域时，则予以“深化”。某些知识分子集团就是用这种方法使情况变得对自己有利的，在心理学方面有巴甫洛夫学派，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是行为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支持者们。在文学评论界中，先是有先锋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代表，后来则有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

采取上述两面派策略所取得的成就，很值得怀疑。确定一条新的意识形态路线，经常意味着消灭这个或那个被认为应对老路线负有责任的知识分子集团，而任何人要想使事态变得对自己有利，就必须使自己在对抗中站在居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一边。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这次运动的受害人对于上次扼杀真正的文化价值的运动负有责任，所以那些参与这一次谴责大合唱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心安理得的、道德上的借口：即认为，表面上看来总政策完美无缺、无可指责，麻烦则完全是那些在过去垄断了执行官方路线的知识分子集团造成的，整个责任只能由它们来负。在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时，只要无愧于良心，那么这种策略就显得更加不可取了。因为当局是最残忍的镇压手段来“纠正错误”的，而采取这一策略所取得的胜利则只是暂时的。经常是：上一次运动的最抛头露面的参加者（不管其参加的理由如何），最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不可避免地改变路线的受害者。

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不仅不允许成立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下组织，甚至在官方政策所容忍的限度内，对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各种潮流的持久明朗化也不容许。只是从五十

年代中期起逐步实行的改革,才为此创造了条件。随着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减少和经济开始平衡发展,官方意识形态的动员功能也逐渐减弱了。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内,官方意识形态的积极干预机能完全不起作用了。如果知识分子对研究的经济目标不去争论的话,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解决的科学问题,完全交由业务集团去解决。现在意识形态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只要不向至高无上的官方意识形态挑战,或者是偶尔地举行一下仪式,表示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官方意识形态就可以了。从事研究的经济条件和组织条件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科技知识分子人数增加得很快。研究的重心从传统的高等教育学校转向自治的或从属于工业的研究组织。由于这些研究组织的等级制度同国家的等级制度是相同的,所以就保证了知识分子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的中下层。

与意识形态关系更密切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变化不太显著。意识形态上的清规戒律仍然很严,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明确要求还经常在起作用。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发生的变化趋向是相同的。恢复了传统学科,具备了发展当代学科(尤其是在数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最基本的条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文化生产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对同官方意识形态关系不密切的文化产品的需求一直在不断增长。那些按法人团体严密组织起来的、享有特权的、专门撰写极其粗糙的通俗作品的生产者集团,不再能够满足已经变化了的需求。文化和社会科学被其他领域的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所同化,这样一个缓慢过程已经开始了。

开始时,通过采取有组织的、适应现存例行制度的演变的

措施，并没有取得上面提到的这种进展。在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中，大规模恐怖活动的结果，导致了统治阶级中的政治特权阶层的分裂，导致了在那些由于曾直接参预恐怖活动而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和那些主张取消对日常生活进行管制的人们之间的分裂。改革者由于想迫使上述顽固反对改革的人让步，公开谴责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所犯下的罪行负有责任，并把这些罪行公诸于众。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改革派试图把追求更大自治权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活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用。他们保护揭露斯大林暴行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斯大林经济政策的小册子，等等。然而，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文化和科学自由，当然是非常靠不住的。因为这样得来的自由，在制度化了的权力中没有任何基础，而只能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介入。一旦政治权贵（和整个统治阶级）开始恢复他们的团结，得到的自由也就随之告吹。但是，一时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可能大有帮助，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所抱有的虚幻的希望。大多数知识分子希望，主张改革的集团的权力一经得到巩固，官方对独立思想的保护将经常化，而最终使在特定情况下的介入成为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在过渡时期内，在那些只是渴望改善知识分子的文化与社会地位，并要求更多的消费量和更优越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同那些要求改革政权的基本制度结构的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分歧还不明显。当时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有可能逐渐地、有组织地从一种状况过渡到另一种状况。这种政治气候的一个特有的征兆是，当时盛行的以手稿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从未反对过官方文学。在社会上流传的打印本被看作是一

种试行本，它随即就会由国家出版社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

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得到克服之日（对东欧各国来说，它们的分歧得到克服的最后时期是在六十年代末）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上述幻想破灭之时。新上台的权贵对自治的容忍程度只限于不让统一的等级制机构受到瓦解的威胁。现在很清楚，文化和科学的自由并没有实现制度化，也不再允许公开进行的辩论按照在非斯大林化年代达到的水平继续下去。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统治阶级恢复统一并非意味着回到斯大林主义。中央机构不再靠大量的恐怖活动来行使权力、压制各种特殊利益。经济的变化已经走得很远了，群众的消费已经和经济的平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扩大消费品市场对统治阶级自身来说也已成为利害攸关的事，因此已不可能象从前那样完全忽视各种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中央机构承认存在上述这种特殊利益，但不让有关的集团以成立它们的自治组织的方式来体现这种特殊利益，也不让它们以制度化的形式把这种特殊利益固定下来。中央机构只是由于发了善心才施舍一些恩惠，只有对中央机构普遍施加压力，相互矛盾的利益集团才能迫使对方让步。在巩固了的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体制中，政治权贵是以在解决社会冲突时（这种解决往往是以政治权贵直接进行干预为先决条件的）垄断了仲裁人的作用来行使权力的。因此，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聚合力，不仅是建立在镇压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各种社会集团勉强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特点。

政治权贵在解决社会冲突时，以垄断仲裁人的作用来行使权力的状况，在工人和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最明

显。中央机构经常进行的干预，保证不断地满足工人关于保障就业和逐渐提高工资的最低要求，同时又保护企业行政方面不受越出这种最低要求的威胁。一方面，中央机构防止经济管理人员把发展经济的全部费用加在工人阶级身上，另一方面，中央机构也可以防止工人举行罢工，防止工人在工厂地区或者在产业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利用这些组织协调自己的行动，以抵抗进一步剥削他们的尝试。总之，一方面中央机构的干预限制了企业领导人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也保护企业不受其雇员不满行动的伤害。对工人阶级来说，中央当局对经济生活的经常干预，似乎也是一种措施，其积极面是，看来可以防止经济管理人员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地位，以牺牲工人的利益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

大多数知识分子本身也接受了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体制的这种新的权力平衡。维持中央机构的调解作用，不仅对工人和企业行政有利，对知识分子也有利。他们如果放弃那些同统一的统治体制不相容的自由，换来的不仅是能过上安逸的生活以及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方面知识分子可以享受到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得到某些真正的文化自由。他们可以在官方规定的清规戒律的限度之内，继续进行创作活动，如果他们的手法高明，还可以取得稍多的活动余地。正是这种形势造就了少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有意识地摆脱官方的文化和科学体制的框框。首先进行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原始积累”；除非他们很快地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否则那些在最高权力当局保护之下经常攻击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知识分子，就会感到他们本身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仅仅是第一步，在斯大林

主义之后的社会本身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积累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

改革时期过去之后，继续对自然科学研究进行的思想控制放松了，标准降低了。然而，关于对研究的控制同政治的联系，以及科研成果被社会运用的情况，又不能瞒过东欧科学家们的眼睛。因此，在这方面，对他们的控制很紧，给他们规定了严格、明确的标准。专业上的自治权不断扩大，这就鼓励这个或那个专家试图对关系到他的专业的社会决定施加影响。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体制造就了在西方社会享有盛誉的专家，然而却不能容忍他们。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科学才能，并以十分天真，然而又以很大的勇气干预社会问题。

另一个造成边缘化的持久性因素与国际上的科学联系有关。强调一下，我们讲的不仅仅是老的社会体制僵化正在缓慢消逝，而且还包括新的社会体制内在的局限性问题。国际上的联系不断地在扩大，然而研究人员，作为个人进行国际联系的机会则非常有限。对私人旅行的控制仍很严，一旦得到同意也只一次有效。并且，只同意研究人员作为官方科学组织的代表，保持定期的联系。然而一些关键的研究部门极其迅速的发展，给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以极大的压力，促使他们要紧紧赶上国外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不甘落后的人，早晚必然要冲破官方的科学组织提出的带有垄断性的限制。这样做会招致惩罚性的制裁，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会使边缘化本身也受到制裁。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冲突，可以选择一种内部的边缘化，就是转向那些国际竞争不是很激烈的研究领域。作出这种选择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少地把他

们的创造性的精力放在官方提出的研究任务上，并且开始思考那些影响到他们目前处境的特定的社会问题。

但是，尽管边缘化的势力经常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但它们主要是在社会科学和文化创作领域内进行活动。就有关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沿着科学组织的等级制阶梯步步高升，意味着在选题上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和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然而，在与意识形态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科学领域，情况远非如此。一个人在官方等级制机构中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要被迫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作出重大的让步。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就有关的社会科学而言意味着，人们几乎找不到可以避免同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讨论题目和某些可供有限的读者阅读的文化作品。科学题目和各种文学艺术流派（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边缘的）能够适应某些知识分子的意向，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简单地选定这个领域就是内部边缘化。作出这种选择的人，并非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他们所选定的科学题目或文学、艺术，而是到官方的公共领域以外去寻求出路。

无论是在选题问题上，即是选择边缘题目还是选择中心题目进行研究，还是在选择文学、艺术的哪个流派问题上，都存在着具体的年龄差异问题，就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来说，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明显，在文学和艺术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对年青的研究人员来说，在他的生涯刚刚开始时，他主要是根据他的专业的内在条件来确定他的研究方向的。在大学学习和做研究生期间，唯有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才在半官方的政治组织中起点作用，只有那些蓄意往上爬的人，才企图在

官方意识形态的庇护之下来完善他们在科学方面的表演。在等级制机构的低层中，年青的研究人员只要显示出自己是称职的，就会有发展前途；他们选择那些表面枝节的问题进行研究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要求出版自己著作的压力也不大。但到了三十岁左右，对于要研究的题目就有必要进行选择了。为了在学术的阶梯上能不断晋升，研究人员必须考虑选择中心题目进行研究，还需加紧活动，争取出版自己的著作。为此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并在政治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在这个阶段，抱慎重态度的持不同政见者走向了内部边缘化，而多数人则试图作出适度的妥协。然而，这样做他们必须具有非凡的能力，还得交上好运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妥协不是导致死心塌地只往上爬，就是导致同管理机构进行对抗，还有可能导致走向边缘化。

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是很难掌握的，这种人并非执意要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企图维护他们的自治。他们每一个人都想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来扩大他搞研究的机会。但是，这样做有可能使其他人的处境恶化。因为他的行动不够俯首帖耳面激怒了神经过敏的官员们。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界要向它的成员施加强大的压力，要他们尊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各项规定。与此同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为了捍卫已经得到的研究和出版机会，还要互相检查。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可以执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至少可以采取偶尔批评的形式。从面科学界中，几代人之间通常发生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质。在这种政治冲突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明朗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发现，他

们不由自主地被推到前面来了，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仅仅在自己认为从道德上还说得过去的程度上表示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就再也得不到什么实质上的好处了。

“低级知识分子”

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发展不断地产生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然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就是这种发展又使这些知识分子脱离所有已经被公认的知识分子。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任何从内部破坏公认的角度规则的行为，都有使他们失去迄今已经取得的地位的危险。持不同政见运动进行的活动越频繁，镇压机构，为了使已经被公认的知识分子不受“异端”思想和态度的影响，就越是野蛮地对科学和文化领域进行干预，也就越加严密地对个人接触进行监视，出版前在社会上流传手稿的危险性也就越大。所有具有批评性的思想都是可疑的了；对公开领域的禁令增加了，要回避官方的意识形态又变得相当困难了。当然，只有进行更野蛮的干预才能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镇压下去。甚至系统地、有选择地对那些已经是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恐怖镇压还嫌不够，有必要采取防范性的恐怖措施，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影响到全部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是反对一切可能导致或设想会导致采取防范性恐怖措施的事情的。从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就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设置了一道屏障。但是，如果舆论本身的压力能够消灭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话，知识分子将是十分高兴的。对

上述的这种普遍规律来说，唯一例外的是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还没有被迫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使自己完全一体化，要么使自己完全边缘化。

已经被公认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各样反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口号。然而，所有这些不同的声音，仅仅是组成总的反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大合唱中的不同调子而已。最温和的态度也是责怪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刺激当局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有些人的调门高一些，我们已经听到了虚伪地怀疑持不同政见者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不纯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要不是他们在政治上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它。”调门更高的甚至连作品的内容都不提，而只提到作者的心理活动：“当然，不应该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在文学和学术上没有成就，以致精神失常，情绪沮丧，他们搞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好可以弥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调门还有比这更高的呢，我们可以听到对他们的公开谴责：“这些人是偏狭的。他们是文化自由的敌人，是比政府更危险的敌人。”调门最高的是，唱着同官方宣传完全相同的调子：“这完全是同西方报刊有联系的恶意诽谤，他们在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声誉。”

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已经边缘化了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同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没有来往的话，他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斯大林主义之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通过使他们当中的很少一部分人边缘化，不仅再次产生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现象，而且还再次产生了

(作为持不同政见运动本身发展的副产品的)社会集团,它为持不同政见者个人提供了一个物质环境。

发展工厂型的研究和文化组织(在东欧各国,它们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部分是由于它们比较来说发展得还不充分,部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禁止它们发展,只是在非斯大林化时期,这种禁止才予以取消),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才产生出重要的社会效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上述这个过程的某些征兆,这就是科技知识分子的实力的急剧加强,研究的重心从大学转到了独立的研究所或附属于工业的研究所。就社会科学而言,我们处在现代意义上的、有组织地进行研究的早期阶段。在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它在群众性的、交流组织的发展的影响之下。

工厂型的科学和文化生产的组织,超出了从属于等级制关系的、标准化的脑力劳动的范围,还产生了辅助人员,记者,数据处理员,档案保管员和翻译,等等。这些工作并非总是由一些长期雇员来完成,从组织工作的观点来看,同自由职业者签订合同比定期付给一些固定人员工资可能还要经济些,因为后者提供的服务往往由于季节的原因而中断。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集团以从事这类辅助性工作作为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我们就把这个集团的成员称作“低级知识分子”吧。

低级知识分子和大规模的科学与文化工业的运转相结合,首先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把他们从工作岗位上撤走,他们也不会陷入真空状态;在知识分子的边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在保持知识分子的生活方

式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同化这个社会集团。当然，镇压机构仍然有能力阻止他们得到前面提到的这类辅助性工作。但是，镇压机构为了这样做，必须随时随地都要进行干预；科学和文化工业分布得越广泛，对那些寻找工作的边缘人员的控制也就越困难。（在这种工厂型的文化出现以前，情况恰恰相反：只有直接的干预，才有可能使那些从合适的工作岗位上被解雇的人找到工作。）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低级知识分子保证给边缘化了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即可以与之进行讨论的人。大规模的文化和科学工业的辅助性工作占用了大量的这样一种人，虽然他们渴望找到一个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但他们没有获得适当的学位或找到同他们的学位相当的合格的工作。然而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最接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退而求其次的机会。对他们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想按照知识分子的消费习惯去生活（收入的其他来源也能够使他们的这种愿望得到满足），不如说来自经常保持同智力活动的接触和沟通知识分子的交流渠道。记者的工作可以接触到社会学的研究，翻译的工作使他同文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保持接触，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在那些获得了学位的低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并不以仅仅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为满足，而是想单独从事某些科学或者文化活动。低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能提交科学界予以考虑，或出版书籍或在官方书刊中发表的机会，比那些被公认的知识分子少得多。因而他们强烈希望寻找一个非官方的公开领域，并且在他们自己的阶层中找到读者、评论家和能与之进行讨

论的人。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的少数人所处的低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只是暂时的，（由于严峻的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他们在成为被公认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上仅仅是被延误了而已，这点也是实际情况。持不同政见者在低级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容易接受他们这一套的听众或读者；对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把他们的抱负讲给反对派听还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由于他们的抱负在已经确立了的科学和文化中没有任何地位，只有在官方机构范围之外，依靠他们自己去设法实现。

地 下 刊 物

接近六十年代末期，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中已经具备了持不同政见运动活动的社会条件。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成的新的权力平衡，几乎在东欧各国都得到了巩固，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自由的界限也已经明确了；在这些界限的范围内，规定了行为的准则；大规模的智力工业及其辅助服务机构已经有了决定性的规模，这使得智力工业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果，包括提供了必要数量的辅助工作。在官方文化的边缘，几乎到处都出现了主要由低级知识分子和由为数不多的知名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非官方的亚文化群。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作品经常出现，正如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发展到了低级知识分子的领域里一样；持不同政见者给低级知识分子的亚文化带来了活力，并把它转化为萌芽状态的对抗文化。从这种对抗文化中又出现了非公开流传的手稿，它使持不同政见者的个人态度，以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客观化了，结果使得

卫文化的自主变成了政治上的对立。但是，当持不同政见运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在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中，当它与科学和文化生产的增加平行发展的时候，地下刊物的出现暂时似乎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只是在一个国家中（虽然这是指的苏联，而它恰恰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地下刊物的确定期地发行，而且流传得相当广泛，说它是个非公开的领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们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在作为反映个人态度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和作为多少有点制度化了的交流手段的非公开领域这二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可以把这种区别解释成，这两种同时出现的情况，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中相继出现的两个阶段而已。如果确实存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种演变趋势的话，我们就有权利认为，苏联地下组织的现在就是东欧其他国家地下组织的未来。

然而我们不能说，一般而言苏联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发展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先进。事实上，在一些特定方面，如大规模科学工业的发展，苏联与其它东欧国家比较居领先地位。而在其他方面，东欧国家比苏联更先进，例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私人消费方面，波兰和匈牙利在文化的非意识形态化方面，匈牙利在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散化方面，都比苏联更先进。与其说苏联简单地代表东欧其他各国的未来，不如说它代表了先进和落后这两种成分的、独一无二的结合。我们不难理解，只是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发展还不足以说明地下刊物出现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官方宣传媒介的极其僵化，罕见的科学和文化的行政机构同恐怖组织的互相渗透，等等。因

而推断说，在东欧其他国家出现了地下刊物的非公开领域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说，存在着重复出现由于发展不平衡和某些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相吻合的可能性，这种吻合有利于非官方的流通手段的形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事实，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这种发展的正规化，可能在东欧各国增加了上述这种使各种社会条件“愉快地”相吻合的机会。

尽管俄国的地下组织明确地表达了它的意识形态并开展了一些萌芽状态的活动，它仍是一种独特的现象，然而下述事实自然是真实的：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发展是产生俄国地下组织的根本原因。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把我们在前面对于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发展所作的阐述运用到这里来。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不要做出超越其自然结论的推断。例如，很明显，俄国反对派的思想特点就不是由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他们的思想反映了革命前的俄国精神传统的共同特点，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绝无仅有的文化上的不连贯性，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整整五十年期间，几乎完全处于与西方的知识发展隔绝的状态；还反映了当代俄国社会无与伦比的道德上的卖淫现象，等等。为了弄清楚俄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知识的踌躇之中作出选择的，在前面我们为了说明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社会的特征而作的全面阐述，对于搞清楚这个问题可以起关键作用。这种全面阐述对于发现在非公开领域内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功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非公开领域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地下组织中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和哲学家究竟是属于哪一个社

会集团的理论家？如果上述的全面阐述成立的话，答案就是，这些处于地下的理论家们的活动不代表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无疑，他们与低级知识分子的关系最密切。然而，低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集团；他们在社会劳动分工和文化方面都依赖知识分子。是有组织的科学和文化生产的发展决定着低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任务的扩大，他们的文化修养，很大一部分就是从那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那里吸取来的。因此，他们没有能力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主体。

我们更不能把年青一代知识分子说成是一个自治的社会集团，他们还没有达到必须在一体化和边缘化之间进行选择的阶段。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集团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少数人倾向于低级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倾向于脑力劳动的等级制结构的高级阶层。

就那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本身而言，他们对待地下组织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暧昧的。如果我们把那些死心塌地往上爬的人撇开不谈，所有知识分子都遭受过挫折，这是导致持不同政见者有意选择边缘化的原因。对于每个作家来说，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尺度已经放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创作自由。每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一进入从官方意识形态的观点看来是“微妙”的领域时，或当他试图做一些用官方意识形态的语言无法加以掩饰的独立的归纳时，立刻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每个自然科学研究人员都要屈从于行政当局为限制科学家之间进行交流而施加的种种强制。总之，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经受由于缺乏情报而造成的挫

折。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不得不遭受这样的羞辱，就是他被迫公开表示赞成那些他在私下里以轻蔑的态度和冷嘲热讽的口吻所提到的思想。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并不愿意看到这种感伤教育导致大规模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即使他们间接地庇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但对待他们的公开态度仍是敌对的。他们不愿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发表的言论中，留下对现存的整个社会机构表示怀疑的标记。

工人阶级对待地下组织的态度又如何呢？同知识分子相比，工人对取缔地下组织并不感兴趣，但是对它的存在也同样不感兴趣。对工人阶级来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持不同政见的对抗文化，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交流的领域内形成的；它是智力劳动的一种最起码的附带现象，它不可避免地使那些同知识分子的辅助文化一致并适应其生活方式的人彼此间发生联系。而工人则做不到这点。这不仅是由于阶级之间的界限造成了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来往不多，就是在工人阶级本身中间也是如此。知识分子进行交流的网络把他们联结成一个紧凑的文化实体，并作为地下刊物传播的基础。而工人阶级则没有这样的网络把他们联结起来。这类交流也不是工人生活方式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要建立一条可以被地下组织用来同工人进行交流的渠道，工人本身必须达到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阶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至少是厂一级的组织。到那时，这些工人阶级的组织才能够同地下组织互相发生影响。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一样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当社会制度发生罕见

的急剧变动的危机时刻，产生了罢工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而当正常的再生产过程恢复以后，由于群众暴动而建立的这些组织决不会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丧失了它们的组织的工人阶级来说，认为地下组织并不是社会现实，而是属于一个与其无关的集团的事情。（更有甚者，工人阶级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个集团的成员一般地是享受剩余产品的特权消费者。这种情绪有时被宣传媒介的操纵者加以利用，使工人阶级从中立变成忿懑：“他们是靠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活着，而他们还不满足？由于他们还要更多的东西，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把地下组织孤立于一些大的社会集团之外，那么反对派的意识形态的唯一功能不就是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本身对话、在道德上为他们辩护并希望他们坚持下去吗？难道我们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非公开领域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这样一个唯一的社会目标？如果事实就是如此，那么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接受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就是地下组织对文化和社会的自由事业有害而无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充其量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同令人憎恶的反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大合唱划清界限；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持不同政见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认识到它不会因人们驱魔去邪而消逝。

上面的这种推理是不攻自破的，而且它还泄露了推理者不可告人的天机。诚然，非公开领域完全不能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如果我们把宣传理解为把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予以合理化的话。即这些利益是同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的制度化了的秩序联系在一起。但是，即使从这种很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讲，政治宣传也不是影响社会意识的唯一形式。还有另一种形式，其影响更广泛，而且同样有效。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用行动来进行宣传。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搞的恐怖主义就属于这个范畴，而在我们时代，非公开领域的理论家们所进行的活动也属于这个范畴。

用行动进行宣传意味着树立一个榜样，那就是通过人们自己的行动来表明，没有必要承认由政权当局建立的世界，而根据不同于现存制度的标准去行动则是可能的。在被统治阶级有办法创立自治的组织的社会中，这种用行动进行宣传的形式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一般来讲，它构不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是这个阶级的组织及其成员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在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特别是当这个社会的制度不仅设法把它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外部强加给所有的阶级，而且还把与它的再生产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也强加给所有的阶级的时候，用行动进行宣传就重要得多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制度的巩固只是，或者主要是靠不可能发生变革这样一种信念来保证，这首先要靠制度化了的机构和制度化了的利益来保证。当然，这种信念在保证制度的巩固方面也起到了它的作用。因此，非公开领域的存在，以及作为个人行为的一种方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存在，削弱了这种制度的巩固性。然而，还不止如此。地下文学作品打破了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思想的垄断，把新的观念和可供选择的其他思想引入社会意识。从这个观点来看，甚至一些最古老的和最反动的荒诞说法，显然也有积极作用，因为它们增加了各种相互对抗的思想的数量。在地

下组织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越多，社会思想就越是千差万别，也越容易比较、鉴别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观。

非公开领域的形成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它开辟了一个真正进行社会和哲学辩论的领域。凡是选择地下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人，不会为了使自己成为当局所欢迎的人而寻求灵活的妥协，或逃避由于他采取的立场所带来的不愉快的后果；相反，他迫使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以此来对抗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一种情况，并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这就是盲目的宗派斗争有时代替了理性的辩论，这是由于地下组织处于孤立状态而出现的一种副产品。还有一种情况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只造成对自主思想的幻想。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如此之贫乏，以致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经常被迫从官方意识形态中汲取一些东西；他们设法在“辩证唯物主义”手册的基础上为自己树立唯心主义的形象，在“科学社会主义”手册的基础上，找出托洛茨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实质。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可以取代官方思想的新概念，仅仅是赋予官方手册的象幽灵一样的敌人以真正的生命力。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在非官方领域中从事的智力生产所产生的总的影晌是令人解放思想。

这种影响究竟有多深，确实难说。然而我们的确知道，它首先影响了低级知识分子和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除此之外，我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地下刊物究竟有多少读者？有多少人虽然没读过地下刊物，但通过个人交流而了解了它？又有多少人能够从手稿文学的字里行间领会它的寓意（这种手稿不时地在官方报刊上登载出来）？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一

个答案也不知道。即使知道的话，也是知之甚少。因为地下组织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非意识形态因素对深深信仰它的人施加影响的，是靠苏联模式的社会的制度发展的内部变化的性质，及其外部环境（苏联模式的社会的制度的发展本身必须适应这种外部环境）变化的性质对这些人施加影响的。对所有这一切，即有系统的变化本身和外部影响，即使有更多的道理，也只能含糊地预告。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没有人讲得清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民粹派的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创伤对于对专制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信念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而今天要估价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及其更加具体的、有组织的表现和非公开领域的地下刊物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并不比那更容易。但是，不管这种影响是大还是小，它是当前在东欧各国大批的人（不仅是某些盲目地走向边缘化的个人）提出下列问题的唯一领域，是同现行制度结合，还是反对现行制度，对现行制度是修修补补，还是另起炉灶。人们不怀疑马克思主义者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各种倾向

就最抽象的实际决定而言，我们的主张同西方左翼的主张并无二致：人们必须声援苏联模式的社会中每一个对他们的制度产生怀疑的人。但是，当人们要更加明确地决定选择的内容时，分歧就出来了。本章所作的解释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这些推论赋予上述声援思想一种与其通常的含意

不同的含意。

首先,现在我们能够按照那些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它引起西方左翼的震惊)本身的社会背景来对其加以阐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以重振道德和复兴文化的纲领来取代政治行动这种作法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拥护,是同地下组织的实际机会有限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指出,可怕的俄国民族救世论的保守性只不过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孤立处境的一种反应。它“说明”群众对于知识分子所关切的事物态度冷漠,由家长制的民间生活、东正教和专制制度组成的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瓦解,导致了人们普遍地从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待价值,即伦理上的虚无主义。它还告诉知识分子,他们搞的文化和道德运动本身能够拯救民族,因为如果民族意识得到了复兴,就会自然而然地重新建立起老的价值观念,以及受过教育的特权阶层与人民之间的有机的团结,等等。我们能够理解,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表现出的不加批判的热情,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缺乏了解(那些由于把民主看作是腐蚀人们生活的例行制度而对其加以全盘摒弃的传统主义者了解的情况也不比他们多),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并不认为自由主义属于经济和政治机制的范畴,而是属于“不可分割”的人权的一部分。并非由于思想幼稚才使那些寄希望于“列宁主义准则”的马克思主义者盼望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而事实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只有国家才是唯一有能力开展活动的社会力量(国家一开始就提出了行动的纲领,这对它来说并不荒唐)。毕竟不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他们刚从地下组织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突然向政治领导人提出

忠告的。我们还能够理解，象俄国正统的“个人人格至上论者”那样一些人（他们拒绝接受关于俄国民族实体的保守神话，也拒绝同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倾向于在社会之外，在宗教的超然存在的范围之内，去寻找个人自由和精神自主的思想基础。

其次，我们认为不仅道义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必要声援持不同政见运动。东欧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喜欢为他们在捍卫民主思想，抵制这种或那种对抗的倾向中所起的作用而沾沾自喜。在“进步的”俄国人的圈子中，经常有人发表一些虚伪声明，摒弃民族救世论，谴责它企图使俄国人民回到家长式的、君主制国家的传统制度桎梏之下。难道人们没有听到过那些虚伪的声明吗？以下述论点进行回答并没有解决问题：反对派的民族主义确实非常令人反感，然而它敢当着政权当局的面炫耀这些非常令人反感的思想，这岂不是一种英雄的姿态吗！然而，人们没有必要把自己局限于这种空洞的美化上面。因为每一种反抗的意识形态，如果它真的具有反抗性质的话，如果它确实冲破了官方关于人的交往和社会辩论的框框的话，就必然含有深刻的民主内容，哪怕它的公开声明是直接反对民主的。那些只试图从内部放松官方制度控制的人和那些惧怕持不同政见者的刺激的人（因为这种刺激危及到已经获得的自由），仅仅是在保护知识分子的特权。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和扩大这些特权，在一个没有任何适当的公开领域的社会中，这些特权属于科学和文化的公开领域。而那些为了创立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的公开领域而脱离了官方的、智力生产机构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向现行制度本身挑战，按照

这种制度，进入公开领域是一种特权，而要得到这种特权，靠的是人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和学历。他们不能承认这种完全反民主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将阻止他们为实现公开领域的民主化而努力。

虽然应该声援所有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运动，并反对那些主张维护现状的人，然而并不是说，所有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运动都具有同等价值。本章所作的阐述的第三个结论是，我们将根据与用来区别西方反对资本主义运动不同的标准来区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运动。我们不用对各种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标准来判断它们。我们不指望这些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或者为有组织的阶级运动创造条件。然而，我们却期待着它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除认为现在的例行制度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信念。我们期望它们不以宗教、民族、种族或其他种种理由，把任何选择边缘化的人排斥出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人们可以以下面这种标准为基础，就是可以批判俄国民族救世论的追随者，指出他们在谈到俄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随时准备参加统治当局施展的民族主义阴谋，或者更糟的是，通过煽动一小撮仇恨少数种族或少数民族的分子，帮助统治当局实现获得积极的群众基础的企图。还可以用上面提到的标准作为基础来批判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具有连续性并指望从上而实行改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只有这些见识，还不能同俄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开始对话。如果有可能开始这种对话，则必须根据上边提出的原则进行。

四 两个体系在运转

两个世界体系趋同的观点几乎和两个世界体系共处的观点一样，是一个老观点了。这种趋同论有许多说法，其中以“工业社会”理论最为流行。这种理论认为，在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史诗时代，早期的技术还没有明确决定生产的社会组织。因而在当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初期，历史上形成的差异就能对社会组织起重要作用，即在私营企业范畴内发生工业革命的地方，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发生工业革命的地方，社会主义得到了发展。但是，当技术发展到了以科学为基础的阶段，上述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差异便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当代技术使得劳动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形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它直接规定出恰当的劳动过程，从而限制其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上述两个成熟的工业社会中，都有同样的劳动技术分工和同样的消费方式，因而产生同样的阶层划分和社会流动性；至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同的；而更重要的是，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在管理社会进程中起着同样的作用。

这些工业社会的预言家并不是由于这两个体系的显著特征有相似之处而得到启发的。实际上他们感兴趣的是，要替西方资本主义作思想上的辩护。他们想证明，当代资本主义

已不再是资本主义,而从阶级观点看来,只是一个中性的工业社会;决定社会进程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技术和经济的合理需要。正如各种起着意识形态作用的社会理论一样,工业社会理论的说服力在于,首先它的内容符合日常生活中许多阶层所经常产生的信念。作为一种理论,它却经受不住考验。它的大部分预言不够准确而无法通过实验加以证实,有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但这并无损于这些预言的信誉,只要它们仍然能够顺利地执行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然而,当“福利资本主义”在文化、社会、生态和最终在经济方面造成的破坏,断送了作为这种理论背景的大部分日常信念的时候,这种理论本身也就立即成了问题。由这种破坏引起的思想运动,一方面否定了技术决定论,一方面对那种认为技术可能是实现任何社会目标的中性工具的想法产生了怀疑。在这些思想运动看来,现代技术已成了压迫的工具。因为现代技术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严重分离,又把劳动过程同庞大的等级制结构联系起来,它就制服了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同时,由于现代技术越来越有效地操纵群众,它也使群众作为消费者面受其抑制。因此决定着社会结构发展的并不是工业社会论者所说的对技术发展的纯客观需要,而是对技术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两个社会体系趋同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上述批评的影响。恰恰相反,正是在左翼社会科学(包括当时正在从追随第三国际的各党中摆脱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以其批判技术的观点从理论上来攻击趋同论最基本的论点时,趋同论就开始渗透到左翼社会科学中去了。就实际经验过的事实来看,甚

至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接受了工业社会理论的预言：两种社会中技术发展的趋势越来越相同，以致劳动分工和消费方式的相似之处也越来越多，而且日益明显的是，两种社会的真正社会权力正在转入某种专家政治的手中。唯一与趋同论不同的是，左翼理论尽管仍照顾到其解释在不同方面的一致性，却已不再断定两个体系都不是资本主义，而宁肯都说成是资本主义了。

左翼对趋同论的看法表明，它相应地醒悟到，东欧的实验并未导致社会主义。左翼看法所起的作用是，最终使西方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苏联模式的社会幻想。结果，它所要表达的内容纯粹是否定的：如果效法苏联的模式，就无法制止左翼社会批评所攻击的那些倾向。而这实际上已经充分表明，东欧社会对待那些受批判倾向的态度越来越同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相似。不过，对东欧左翼来说，提出问题的出发点是不相同的。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两个体系有哪些相似之处，而最重要的是，还要弄清两个体系各有哪些不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也是名副其实的阶级社会，但是，实行阶级统治的手段和发生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则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循环的动力及其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根本不同的。等级制劳动分工无疑有相似之处，但也不能忽视其间的差异。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在东欧立得住脚，就不能忽视所有这些差异。而且，甚至那些确实相同的现象，我们也不可能象西方左翼那样来加以对待。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结构不会重新出现象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方式和重技术风气那样一些受过批判的现象。我们还必须弄

清楚,是哪几种机制在重新导致这些现象,因为“相同”的现象如果是由不同的机制产生的,那么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看,它们并不相同。

左翼趋同论不承认两种社会在社会结构、体制结构和阶级结构方而有任何差异。赞成这种理论的人辩解说,这些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在两种制度可以观察得到的活动中并没有产生重要的结果。因此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就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应确定两种社会的社会—经济模式,然后从这两个模式中推断出两种社会的活动规律,包括不同的和相同的规律(尽管产生于不同的原因)。如果我们从各该模式中成功地推断出左翼趋同论所说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趋同论所唯一阐述的对某种事物的解释。如果我们同样成功地从各该模式中推断出系统的差异,而且从中得出的论断也能为经验所证实,那么我们也可以各该模式来阐明与趋同论相抵触的其他现象。

本章远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也不企图系统地阐述这些模式,只试图证实存在于经济组织和阶级结构范畴内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差异。因而我们不能提供关于两个体系活动规律的严谨推论。由于上述侧重面不同,我们只能满足于简要地讨论一下活动的规律。这样至多能做到使我们在理论上的不同之处看来有些道理。但是,这只是开个头,也许能有点好处,特别是我们想借助于用这种方法概述一下两个模式,就能成功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趋同论最喜欢引用的恰恰是这些现象之间的重要差异。

我们的方法是,只把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辩论课

题的差异仍保留在其本来的模式中。然后，我们将仅仅探讨存在于两个模式中的一般差异。这就是说，我们将撇开那些同最初的历史条件有关的差异，例如苏联模式的社会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落后性，苏联早期积累过程中的世界经济和政治背景，等等。这样，我们在对待我们自己的模式时，就不至于在出发点上有所不同了。经过这样筛选之后，便进一步缩小了我们所能叙述的社会进程的范围，仅仅作为第一步，这样做看来是得当的。用这种办法，我们就可能回避这样一种危险，即力图用我们自己的模式来解释本来由于历史环境而不是由于制度特征造成的那些差异。

我们将要探讨的这些结构上的差异，完全同下述正统说法有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居统治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生产资料则是国家所有。所谓“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我们往往指的是享有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买卖剩余产品的权力；指的是股东可以影响其投资的使用，至少他们可以从某个企业抽走他们的资本而将其投入另一个企业中；指的是一部分企业的股票全部或绝大部分由私人或其他私营企业所拥有，以致国家无法直接干预；最后，我们总是认为，经济活动的私营领域影响到整个制度的宏观经济活动，影响就业、国民收入、价格和工资方面的变化趋势，以及围绕着这种趋势的周期性波动。所谓生产资料国有化，我们指的是每个经济组织都服从于统一的国家行政机构，生产原料的分配也根据不同的水平由国家行政机构的分支机构安排（除了某些从整个经济观点看来不甚重要的例外情况），以致任何类型的资本市场都既剥夺了收入权，也剥夺了决定权（毫

无疑问 这里所说的国家所有权并不是非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经济组织

资本主义的经济可以被看作是下面所设想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把企业同消费者联系起来。另一种是，企业都是一些强有力的大公司，它们对市场形势完全可以不闻不问。按照前一种模式，对企业来说，市场参数是企业必须加以适应的客观数据，而在后一种模式中，企业不是要适应经济环境，而是要使经济环境适应企业的投资、发展和生产计划。

很明显，后一种模式比“纯竞争”的模式更接近于苏联的经济模式。一种通常的说法是，现在历史的发展正处于从前一种模式向后一种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因此争论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已经实现的集中化达到了何种程度。为了目前进行的研究的目的，上述两种观点使我们倾向于假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独立于市场力量的现象的发展已经达到最大的可能。因此我们只须指出限制这种发展的一些界限，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些界限是决不可逾越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个因素妨碍供求机制的废除。第一个因素是经济活动的环境变化不定。无论是公司的发展还是结合，都不能完全无视经济环境的难以预料的变化。在原料供应方面，在技术发展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方面，经常发生

不能预料的变化。即使那些最大的公司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种生产因素的投放，消费者的需求也是无法完全控制的。控制消费需求仅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控制消费需求是如何影响需求结构和整个需求量的。从而，就使得投资和获利的可能性以一种完全不能预见和并非一成不变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供与求这种变化不定的状况。

限制向有计划地进行生产的方向转化的第二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股份占有的交叉和董事会的成员的交叉的情况，造成了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一个大公司购买另一个大公司的相当部分的股份；两个大公司的股份中的相当部分又是某一个人或家族的财产；两个企业，在它们的董事会或它们的管理机构中，有共同的人员，等等。在私营企业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类似的联系。国家可以购买私营企业的股份，反之，私营企业或者个人也可以购买国家企业的股份。但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发展到占领整个经济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许多实际上彼此独立的，并独立于国家的大集团。由此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企业是典型的在财政上自立的，即它们必须量入为出。这样它们就不能把为冒风险所支出的费用转嫁给其他经济组织，而必须使自己适应不可预测的环境，即市场形势的变化。

只有一个经济组织即国家，严格说来上而谈到的这种情况对它并不适用。国家的大部分收入不是来自生产、服务或商业活动，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对国家收入如何使用，并不取决于以创造新的收入为目的。因此，国家预算可以起减震器的

作用。譬如，在一个庞大的企业濒临破产的时候就可以发挥这种作用，为了保障就业，防止出现不利的市场反应(或者仅仅是由于院外活动集团施加压力的结果)，国家可能在税收方面对企业做出临时性让步，或给予优惠贷款和有利的订货。在国家决定进行这类干预时，它能够相对自由地行动，这不仅由于国家能够利用其所支配的财政和物质资源来支付它的费用，而且它还能够征收特别税，或者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来增加货币的投放量，等等。此外，它通过采取诸如法律性的工资政策，或法律性的价格调整等手段对经济加以扶持。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它不能随心所欲地增税，因为这样做会减少通常所说的投资欲。它不能长期地使货币投放量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因为这样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并使经济机制遭到破坏。法律性的工资和价格调整经常导致捉摸不定的后果，除非管制全部经济活动，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战时经济中才能这样做。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只能达到私营经济的活动方式所允许的限度。私营经济是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对国家的干预作出反应的。如果国家采取的行动不符合私营经济的活动方式，则国家采取的这些行动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例如反(经济)循环的措施如果搞过了头或不是时机，则可能产生混乱。

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摆脱经济环境影响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受限制的，尽管这种可能性还是大得多。要准确地预见生产诸因素和消费者爱好的变化同样是做不到的。财政自立的原则在这里也是行得通的，至少是就经济的整体来说是如此，

因为在任何一个封闭式的制度中，总支出不可能超过总收入加上总储蓄量之和。但在企业一级，则没有必要这样做。除了那些有特殊意义的、规模不大的企业和商业服务设施外，整个经济都是按照一个单一而统一的、行政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苏联模式的经济也有两种典型，并且也是从一种典型走向另一种典型。第一种是集中化的典型，中央权力当局详细规定生产什么、生产的数量，规格以及使用什么工具和原料等等。并按上述的次序分别下达单项计划指令，把必要的物资调拨给各个企业使用。鉴于这种情况，各个企业按照明确的规定，不是财政自立，因为它们使用的物资不是长期由它们支配的。它们对企业的财政亏损不负责任。对它们来说，商品滞销并不需要改变产品品种。第二种是非集中化典型。中央权力当局只向企业提出总的指标（例如企业必须完成一定的利润），企业为了完成上面提出的指标可以自行支配物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能够做到财政自立，但是，即使在事实上没有一个单独的企业是财政自立的，经济同样可以正常运行。（当然这不等于说总的增长是负增长，因为国家所得的盈余可以大于企业造成的亏损）。

指挥系统的分散化，并非意味着在体制上企业取得了对国家的自治。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性依然存在，即使国家并不干预企业活动的每个细节。企业负责人的任免和奖惩都要由中央权力当局来决定，即由等级制结构中的同样那些机构来决定；它们通过操纵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来控制企业进行投资的各种可能性，而同时又通过党和工会控制企业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

下面我们探讨有关投资的情况。假设投资的体制理想地分散化了，就是说撇开所有基础性的和非经济性的投资，每一项投资都由企业一级决定。但这并不等于每一项投资都用企业本身的储蓄金来支付。苏联模式的企业恰恰同资本主义的公司一样，也依赖外界的投资来源。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寻求外界的投资来源而使它依赖于国家与私人资本在那里进行竞争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而苏联模式的企业则依赖国家的行政等级制机构。原则上一个苏联模式的企业能够利用三种投资来源：其他企业的资本、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的支持。事实上第一种投资来源的可能性，就是在法律上对此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也是微乎其微的，对指导经济的个别有关部门来说，允许它们不能直接加以控制的企业，通过向它们所控制的企业投资来施加影响，是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同样有些企业也不愿把资本投到由那些与它们疏远的行政等级制机构的分支机构所控制的领域中去，因为这样做不符合这些企业的利益。中央权力当局对其他两种投资来源实行严格的控制。企业为了争取到预算支持和银行信贷，相互间可能进行竞争，但是，中央机构对于投资需求，不与任何人竞争。因为真正的投资决定，即使在投资体制理想地分散的情况下，总的来说，最后也还是要中央当局的参与下才能作出的。

企业没有任何法定的自主权可以限制苏联模式的国家对企业活动直接施加影响。由于国家干预给那些顺从的企业造成的相对的或绝对的损失，国家要给予补偿，即使如此，也并没有限制国家对企业的影晌。首先国家拥有各种手段，可以用来平衡企业的资金。由于苏联模式的国家控制着生产资本

的利息,决定着企业的工资基金及其分配的方式,管制着价格体系,所以它除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税收让步,信贷支持)以外,还能够采取更进一步的特殊措施。其次,苏联模式的国家运用这些手段比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它们的手段更得心应手。限制国家的行动的唯一因素是实际上的预算的宏观经济比率(例如,它不能长时期地缩减用以保证社会可接受的消费水平的那部分预算),但是,它不受企业的期望和无法预测的反应的约束。我们还是看关于投资的例子。哪怕价格体系经常发生混乱,或者把全部盈余分配给了亏损的企业,国家也用不着担心投资的愿望会下降,首先,绝大部分投资是在国家的参与之下提出的,因而国家能够直接影响这部分投资。其次,企业不会因吃不饱而为难,因为当它发生亏损时可以指望国家的支持。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苏联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在两种经济中,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某种混合状态,把生产、服务和消费过程协调起来。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私人所有权的存在,不允许非市场关系取得优势。不管国家和大公司的自由扩大到什么程度,市场始终是首要的范畴,非市场的活动必须适应这种范畴。国家所有权(如前所述)对非市场活动构不成障碍。相反,中央的控制与企业之间的等级制的依赖关系,对作为主要范畴的市场还是施加了许多限制。如果在两个体系彼此最接近的、这种假设的边缘情况中,甚至还存在着差异的话,那么就更有理由认为,在所有的其他情况中,也必定存在着差异,就是说在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实际存在的苏联社会进行对比的时候,在两种社会之间,到处都存

在着差异。

阶级结构

乍一看,上面提到的差异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阶级,包括工人阶级都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任何阶级,即使是统治阶级都不能独立地将自己组织起来。但是,把这种差异放进前面列举的模式中去是毫无意义的。上述说法中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那部分,虽说对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是适用的,但也有重要的例外:它对法西斯主义和军事独裁就不适用了。而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去探索那些存在于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最普遍的差异,以找出下列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独立的阶级组织被吸收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现象是如此之普遍,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却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如果我们把涉及到阶级组织的这些问题撇开不谈,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结构上的差异,这就是不同的统治阶级同财产的关系上存在着差异。简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中有一个财产占有者阶层,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却没有这样的阶层。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两种社会体系实质上是按照一个相似的方式运转的。他们认为上面谈到的差异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或者争辩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经济权力并没有掌握在拥有财产的集团的手中。或者争辩说,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统治阶级也是一个拥有财产的阶级,它以大公司股

东支配公司资本的同样方式支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他们的第一个论点。它所根据的是众所周知的、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的、学究式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论点，即认为公司越大，资本的所有权就越分散，掌握在私人手中的股份的比重也就越小。从而，公司不可避免地发展到这种地步：股东已经不再能通过投票来影响企业的经济战略。从这里再进一步就引出下面的结论，真正做出经济决策的，已不是企业的股东们，而是企业中等级制结构的最高层——高级经理们。私人所有权变成一种仅仅是附带现象；它对收入的分配和消费水平的差别起作用，但对经济和政治权力，则产生不了任何影响。真正的权力，就象苏联模式的社会一样，是与大的组织、大公司和国家中的关键职位联系在一起的。

按照我们的推理方法，我们将承认，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的论点事实上是有效的，尽管我们意识到，对支持这一论点的实践根据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恰恰是在社会学者中，与此对立的论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是，如果甚至在这种边缘的情况中，我们都可以找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结构中存在着许多重要差异的话，那么我们在观察其他事例时，就更不必论证其中也存在着差异了。

现在我们设想，股东实际上不能再通过投票方式对企业的管理施加肯定的影响。然而，他们仍能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企业的管理施加影响。如果他们对他们得到股息不满意，就可以从公司中抽回他们的资金。只要资金是可以自由转移的，就是说，只要资本市场还存在，总的来说，大公司的经理就只能完全象传统的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的所有者——经

理那样去做。管理部门的经济权力确实是同组织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却是一个一个的产权所有者势力。在所有权和管理权完全分开的情况下，这些产权所有者势力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即资本市场的力量来控制决定权，仅仅这种力量就足以把公司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因此管理部门不能简单地同国家的专家政治相结合；不能成为公司一级的同国家机构有联系的势力的代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部分，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受到独立的经济势力的支持，同其他阶级和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抗衡。

还剩下另一种论点，按照这种论点，苏联模式的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一个“集体财产所有者”阶级。确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企业所拥有的全部权力，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却分属于行政等级制机构的各级和各部门。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中，没有任何与股东大会或资本市场相对应的职能机构。也没有任何应该对投资效果负有责任的专业机构和能够自由地把它们的资金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其他企业（如果它们对投资效果不满意的话）的专业机构。所有权功能被分配到行政等级制机构的各个部门，并且错综复杂地同非所有权功能交织在一起。例如：保证政治稳定和保证宏观经济平衡的任务就交织在一起。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一个人之所以属于统治阶级，就是因为，并且仅仅因为他在国家的行政等级制机构内部起着作决定或为作出决定准备的作用。他的全部权力是同它的官职或同他在他的公职活动中所

建立起来的非正式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权力不会得到与国家行政等级制机构无关的私人的支持。因此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集体财产所有者”阶级是错误的。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各个部分显然从属于最高政治权贵，他们垄断了国家行政等级制机构的最高层。指挥系统的非集中化当然扩大了行政等级制机构的下层分支机构的决定权，但是，它并没有建立贯穿行政机构的上下级关系的、那种独立的经济权力。即使在一个理想的分散化的体制中，企业经理在自治的经济结构中也不是第一把手。企业的经理不受资本市场的控制，甚至不受与资本市场相等的某种职能机构的控制，但却受统一的行政等级制机构的控制，归根结底，受统治阶级的政治权贵的控制。如果甚至在两个阶级的结构彼此最接近的这种边缘情况中，阶级组织产生的机会和阶级斗争可能采取的形式都是大不相同的，那么在所有其他情况中也一定是不同的。

结 果

让我们首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曾经引证的例子，他们说，在两个体系之间，如等级制的劳动分工，技术的发展和消费结构等，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异。然后，我们将讨论尖锐地摒弃趋同论的一种现象：经济周期的动力。最后我们将考察一下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两个体系中，开展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如何？

趋同论在说明下述事实时，它是正确的，即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工厂和企业这些经济生产单位的社会组织极其相似。在这两个体系中，都可以把由这些经济单位的正式组织所决定的各种职务，根据这些职务的占有者处理生产的物质因素的程度，及其对参加生产的个人行使权力的程度组合成一套等级制度。在这两种社会中，这种等级制度都是与收入的高低和威望的大小一致的。在这两种社会中，恰恰都是这种认为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在为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进行辩护。正如现代技术所宣称的那样，它要求直接生产者只应是主要工作任务的执行者。而规划和协调这些主要的工作任务则要求合格的高级脑力劳动。作为报酬，社会必须给予这种高级脑力劳动以适当的特权。

在这两种社会中，基本上一致的权力、声望和收入阶梯也超出了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的界限。上面概略地叙述的各种模式也引起了人们对一种重要差异的注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公司的等级制的扩大与官方组织发挥其组织作用的等级制并不一致。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工厂和企业的等级制则是统一的国家行政等级制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社会的最高等级看作就是一个社会阶层。从其组成来说，这个社会阶层不是单一的。各种独立的经济、政治、国家行政和科学等等机构中最高职位的人统统属于这个阶层；还有一些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组织则是通过继承了物质和文化方面的特权而进入这个社会权贵阶层的。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则是按照统一的国家行政机构等级制本身来规定社会权贵的范围。

上面提到的这两个社会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异，其根据是它们的组织结构的形式不同，以及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同。因而就提出了这种差异本身是否真正存在的问题。

可以争辩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形式上独立的组织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那些并非依靠这些组织而得到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权，正在失去它们的传统意义。然而，倘若我们（似乎立即就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模式的条件，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至少是一些重要的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彼此还是直接竞争的，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下述这种情况的重要性。这就是组成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每一个部分，如果要使它的成员在行为上保持一致，而各成员间非正式的联合又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必须建立一些同其竞争者同级的或高一级的组织。对苏联统治阶级来说，建立这类组织却意味着破坏统治阶级体制上固有的团结。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可能还有另一种反对的理由，就是这两种社会的工厂里劳动分工的等级制度是完全一样的，不管它是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就直接生产者的处境，劳动的过分专业化和重复，以及作出决定与执行决定两者的分离而言，难道我们指出的差异是中肯的吗？就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言，必须承认这种反对的理由是对的。但并不等于说，这种理由对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是适用的（我们所说的这个集团，其成员是参加物质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并且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一样，对其他生产者并不行使任何权力）。这两种社会在生产活动的性质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对生产活动来说，超越制度上的和企业

间的障碍进行交往是必要的。西方的批判的社会学认为，由科学和文化创作活动的等级制结构所引起的紧张关系是无所谓的。其前据是，给发展这类创作活动提供的最理想的条件是非极权主义的交往。按照我们的模式则不难看出，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这些紧张关系是明显地以不同的、并且是更加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以科学研究工作为限，来说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差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研究的等级制结构的功能并不是要取代各种非极权主义的交往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科学界形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公认的等级制结构的功能是加强那些特别重要领域中的交往，从一个组织本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目标来看，或者为了使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使用起见，这些领域都是特别重要的。自然，上述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影响，把极权主义的因素引进了科学界的交往之中，并限制了它的自主。但是，不管这种影响有多大，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界的情况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科学界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成立科学研究的等级制组织，不仅仅是出于利用科研成果的需要。由于各种研究组织的内部等级制是统一的国家行政组织的相应分支机构的等级制的扩大，所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研究的等级制组织与科学界的自主之间的冲突一直带有潜在的政治色彩。行政机构不能容忍在任何社会集团的内部出现自由的、非极权主义的交往渠道。这些渠道可能形成独立的自我组织的基础。而这种倾向又会危及它在情报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垄断。因此它不可能允许科学工作者越过个人接触的限度，也不可能允许他

们就某些研究方案的选择，科学的社会用途和研究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甚至行政机构还力图尽可能地限制能够传播上述这类不同意见的个人交往的形式。它千方百计地防止那些无视等级制组织形式的科学流派或倾向的出现，并力图控制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交往。当然，完全废除自主将使科学退化，这将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带来难以忍受的损失。甚至在最严厉的政治控制之下，科学研究人员还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以进行交往和形成自己的见解。与其他社会集团相比，这就使他们和文化创作者处于一种特权地位，至少在意识形态的自觉和聚合可以达到的水平方面是如此。但是，行政机构所作的这类让步，从来不会走得这么远，以致为在科学界内部进行非极权主义的交往而创造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把这种交往看作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正常条件。

在某些当代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对既要保持等级制组织，又要保证非极权主义的交往这种互相矛盾的需要，正在通过妥协来加以解决。甚至在社会科学中，行政机构下命令解决那些带实质性内容的问题的现象也是罕见的。在某些问题上更多地是回避进行探讨。学术界为了争取自己享有这种程度的真正自主，它不仅要在组织问题方面或者在研究经费方面完全放弃参与作决定的权利，而且还要一再郑重其事地表示认可行政机构有权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对研究成果的内容施加影响。而行政机构并非不断地运用这种权力，它通常都是让科学界自己对那些有“偏离倾向”的成员进行思想控制和非官方的审查。这样做，无论如何，还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这种妥协的结果，把一部分新一代知识分子

拒之于研究机构之外，因为他们不能掌握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行业规则。

如果我们象在另一章中所做过的那样，放宽我们的模式在开始时的条件，并用它来研究苏联知识分子的状况，我们就能够表明，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过着低水平的生活，在有组织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干的是辅助性的工作。他们多少还能够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与之有关的交往习惯。很明显他们不属于官方知识分子。在每一个东欧国家，这个低级知识分子集团是对抗文化的社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甚至也能够产生秘密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运动，正象在苏联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技术的发展

乍一看，我们可以认为在技术领域内上面提到的各种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无足轻重的。向人性化了的、将破坏等级制劳动分工的技术专家体制转变，并不符合两种社会当中任何一种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论在那一种社会中，被压迫阶级都不可能使这种技术专家体制成为现实。表面上看来，之所以有差异仅仅是由于起点不同，就是说东欧社会相对地落后，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差异在不断地减少。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模式所产生的结果，更加深入地进行思考，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技术之所以落后，是由制度本身造成的，而且这种落后状况还一直在更高的水平上持续地保持下去。因此，置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

压力于不顾，引进西方成功的技术，在经济上是非常有利的，以致在开始时对其他任何选择都没有考虑的余地。在两种社会中技术发展的趋势并不一样，因为技术发展趋势是由两种社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它又是一样的，因为在苏联模式的社会的经济模式中，技术是内在的落后，这使得苏联模式的的经济更愿意借用现成的解决办法。

我们对两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在发展技术方面的结果作些比较。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在试验并实行技术革新时，主要为三种愿望所推动。这三种愿望是互相联系的，但在进行抽象的分析时又是容易分开的。这三种愿望是，节约各种生产因素，刺激需求和从利用尚未最后肯定是成功的技术的可能性中取得优势，因为新技术的经济重要性一旦明确了，这种优势在同其他组织竞争时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考察一下这些愿望在苏联模式的的经济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远不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有生气。

节约各种生产因素也是苏联经济部门的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经济体制的分散化和取得了标志着成功的纯经济指标的增长，使得这种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企业的各项决定产生影响。但是，从苏联的经济体制所独具的特征来看，冒进行试验和实行技术革新的风险，并非永远符合企业的利益。在同上级经济部门讨价还价时，企业把它的技术设备水平作为不可变的数据，并以它被迫使用超过正常数量的某些生产因素为依据，力图得到更多的资源。这样做往往对企业有利。

刺激需求在苏联模式的经济的技术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苏联模式的经济在初期的落后状况直接决定

了它的消费品市场的形势。由于宣传媒介广泛传播的影响，消费者追求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市场上的商品。而从我们的模式来看，生产物资市场即使在最分散的体制中，供与求的作用也是很小的。

还有第三种愿望。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当然只有经济管理部门的最高集团才能对是否采用新技术加以考虑，而这种愿望本身并非是一个不利条件。这方面的结果如何有赖于经费的多少，发现有希望的新领域的可能性和适当的科学研究水平。然而关键是，新的科学成果决定了它们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因为投资的多少意味着对研究工作实行最严格的周密的控制。继续阻碍科研的发展（我们在叙述第一点时提到过这个问题）带来明显的经济损失。

消 费 结 构

我们在前面曾大胆地提出过，苏联模式的经济正在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市场中的供应结构。看来这同我们的模式的最初主张是直接矛盾的。苏联模式的经济更难于适应个人消费需求的提高，这难道不是从我们的模式中得出的结论吗？在一个由中央控制的经济中，发展集体服务设施难道不比满足单个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更为经济合算吗？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难道没有把发展消费转向发展集体服务设施的全部手段吗？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含含糊糊地回答“是”。对最后一个问题则需要更详细地进行讨论。

经济管理的中央集权制原则上有可能确立集体服务事业的统治地位。中央权力机构原则上有可能减慢货币收入增长速度的各种手段，用与中央统一管理的经济的平衡能力更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更有力地控制消费品市场，从而使集体服务事业在直接的分配系统中保持不断增长的比率。工人和雇员阶层不能左右中央的这类决定，他们最多只能以零乱地施加压力的形式来表示不满。但自相矛盾的是，统治阶级在这个领域中的权力之不可控制性反而限制了其活动的余地。工人和雇员阶层由于无法控制集体服务事业的分配体系，便想方设法增加货币收入。他们设法以任何人都无法干预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消费问题。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只能使用大量的恐怖手段这一武器来顶住工人和雇员阶层的这种欲望。如果苏联模式的社会不只是依靠公开使用暴力来维持其稳定，而更主要的是依靠在人民群众中的某种意见一致的话，它就不得不容忍这些压力。一旦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和个人的货币收入开始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过程就会自动延续下去。投资越来越多地把各家各户，以及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按照西方模式与消费组织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为消费品工业和商业打下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用西方的模式来满足个人的各种需求，比着手兴办集体服务事业更为经济实惠。因为后者在开始时需要花费巨资，而且从这种投资回收利润是很慢的。尽管至少在原则上，各种办法最终会提供比较廉价的服务。保持我们上面所说的现有结构比改变它更适合于达到经济体制的货币平衡。如果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降低了，而用于集体服务事业的开支又相应地增加了，这将在消费品市场上出现商

品供应和人们的货币收入之间的紧张状况。而对集体服务事业的投资需求将超过资源所能负担的能力。

六十年代,在几乎每一个苏联模式的社会中,下述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了,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系统的、大规模恐怖的减少,有必要在较短时期内,大幅度地提高消费水平。不得不猛然增加货币收入,因而也不得不迅速相应地充实消费品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已无余力长期发展集体服务事业。这一过程首先以增加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开始,逐步扩大到耐用消费品,在某些东欧国家中,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住房,是通过市场的形式来提供的。东欧各国都生产足够数量的必需的家用电器以发展家庭自我服务,而且各国的小汽车消费市场也在迅速地发展。

随着私人消费逐步取得支配地位,明显地带来了左翼所批评的回方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家家户户都热衷于抢购物质用品,浪费资源、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但是,如果我们牢牢记住,这种与西方社会相似的消费方式是产生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中迥然不同的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完全相同的。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私人消费的作用的增加毫无疑问具有积极的结果。这种结果表现为,在经济方面加强了人们对中央集中管理的经济组织的独立性。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把这点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发展,即使我们还不能预见到它的确切后果。随之而来的并非不可能将是在工人阶级当中,特别是在年青的一代人当中,个人的持不同政见倾向得到加强。对他们来说,父母的经济条件越好,就意味着他们暂时

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和更小的挣钱的义务。

经济周期

这两种制度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都是周期性的。就是说它不是沿着平衡的轨道向前发展，但总是围绕着一个总的方向或多或少地、剧烈地波动着向前发展。在这两种制度中，由于都是投资周期决定着其他方面的浮动，所以这两种制度的表现也是相似的。然而，就投资周期本身而言，在两种制度之间有许多基本特征是根本不同的。现在我们仅就在投资周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加以阐述，并试图把这些差异同两种制度的模式联系起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的高潮一般达不到物质能力的极限(它使全部现行投资的增长率不可能保持不变)。所谓物质能力的极限，指的是在全部投资已开始后的一个可以宽容的期限内，投入生产的原料的数量不能与需求同步增长；建筑设备投入生产的增长量不够快；劳动力的储备完全耗尽，等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商品供应短缺而使不变投资增长率受到限制的现象不是经常出现的。只有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当投资增加得相当快，而由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平衡，致使消费品的生产速度不能与因为扩大就业造成的收入的增加保持一致的时候，才会出现上述限制投资增长率的现象。在投资高潮遇到上面提到的障碍之前，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刹车就已开动，并使整个过程倒了过来。

而在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下，通常只有当资源确实不足

以保持投资率，或者当商品供不应求而需要转换资源时，才能达到投资周期的最高点。那些对外贸特别敏感的小国，靠扩大进口和限制出口来暂时缓和资源与消费品短缺的矛盾，在这些国家中，投资高潮的绝对最高点是和外贸逆差相联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严重的供应困难和生产堵塞导致改革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运转混乱，通常都是由于周期变更引起的，甚至只是在发生特别严重的危机而不是一般的衰退这些罕见的情况所引起的这种危机，又是在异常的投机性的经济高涨之后发生的。这意味着，我们得到的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关于群众消费发展的片面情况，如果我们只注意总的倾向的话。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尽管缓慢，但确实在提高，只是这种提高的趋势定期地被一些多少有些严重的供应问题所破坏。发生这种问题时，就伴随着削减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的企图。因此，投资周期的最高点往往也是人们的不满情绪增长的时候。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投资周期的上限同典型的饥饿骚乱或类似的动乱在时间上一致。

不得不以长期的衰退或者萧条来抵偿长时期的经济景气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对投资的限制只会持续到物质能力的提高或消费品的丰富(或外贸充分平衡)足以使上升的过程重新开始为止。危机从来不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它一直是一种经济匮乏的危机。

当我们提出两种经济制度的模式时，我们指的是资产阶级企业家的投资欲望是根据他们所期望的资本利润的功能而变化的(更确切地说，是根据他们对投资所期望得到的利润的功能、投资费用和一般利率的功能而变化的)，而在苏联模式

的经济中，投资功能对企业贪得无厌地寻求投资的欲望绝不产生任何影响。这种差异说明了两种制度在投资周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方面的不同表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投资高潮开始下降和相互竞争的投资额大量地增加，投资费用增加了，期望得到的收入减少了。同时，由于对货币的需求增加了，利率也就提高了。发生上述这些变化时，可能比较顺利，也可能带有戏剧性的突发性，这就看投资者在情况好转以前表现出的“盲目乐观情绪”所起的作用如何了。但是，如果直到投资的增长在事实上已经达到了物质能力的极限，或者达到了消费商品供应的物质限度的时候，企业对日益缺乏的资源的提价全然没有作出反应的话，那么就一定会产生特别强大的诱惑力，引诱人们去投机。在正常情况下，投资的热情便开始过早地下降，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生产增长率的下降。类似的情况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为了摆脱衰退或萧条，仅仅使提高投资率成为实际可能，是不够的。在这之前，必须出现各种有利于资产阶级企业家所期望的变化：库存积压物资的减少和“信心”的恢复，等等。

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无论是对于经济景气或对新的回升，都不存在这类内在的制动器。企业对增加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敏感，因而对中央当局不断施加压力，以争取增加投资基金。而中央当局也顶不住这种压力。一则，通过投资来给予支持，是中央当局用来酬答那些听从指挥的企业的一种手段。它们被迫使用投资支持的手段来同企业经理们作交易。二则，中央当局一般无法预测单项投资的实际费用。向国家

申请投资的人，几乎总有办法弄虚作假，使与实际不符的、低的投资费用得到国家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批准，一旦中央当局开始投资，在任何情况下它迟早总会同意拨给为完成投资项目所必需的额外费用。因此，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甚至在中央的计划并没有把规定投资增长率最高限额作为一个目标时，那些极力主张过分投资的势力就控制着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事实上，企业对投资的渴望和中央当局的野心这两种愿望所起的并行不悖的作用，几乎一直共同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循环。

一旦由于平衡遭到了破坏而停止了投资就会对投资产生影响，一旦有实际可能再次加快投资，对于投资高潮来说，就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障碍。只要对新的投资和对投资提供支持或信贷的限制一经放松，就又开始了对投资来源的争夺。

阶级斗争

我们已经按照我们提出的模式的轮廓，概述了两种社会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基本差异。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社会集团在处理它同国家政权的决定的关系时，都拥有通过其自己的政治组织代表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甚至连统治阶级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现在，最后我们必须对这两种体制的行为特征加以说明。

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是在社会的私营部门中进行的。这种经济活动当然一直在影响着国家当局的决定，正如我们在扼要地阐述我们的模式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影响越来越强

大。然而，我们还要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运转的私营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意味着，在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彼此进行竞争的集团。每个集团都要得到同国家合作的好处，都要使国家作出的、对基础结构投资的决定对自己有利，都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得到有油水的国家定货的集团，等等。但是，这些集团在竞相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时，其力量并非都是一样的。那些较弱的集团，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手段对国家当局的决定施加影响，使国家当局给它们以一定的非经济的好处，以抵销它们在经济上的失利，那么在较强的院外集团同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具有排他性的情况下，它们只得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垂手观望。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的制度，保证了资产阶级内反对集团能够得到这些手段。按照个人行使的政治权利来规定代表的比率；互相竞争的资产阶级集团从而不仅有会估量它们本身反对其他集团的力量，而且还有会竭力聚集社会上其他阶级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由于资产阶级各集团所拥有的经济力量不平衡，所以一些往往并非无足轻重的集团，对保持作为平衡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手段的代表制度感兴趣。

当然，按照个人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被授予同等政治权利的人，对国家当局作出的各项决定所施加的影响，并非都具有同等分量。政治组织的力量和影响舆论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背后支持它们的经济力量如何。这样，资产阶级的各个利益集团拥有的经济力量的对比，甚至可以在进行政治竞争的公开领域中体现出来。但是，上面提到的这方面的经济实力上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选举人的利益来

抵销。

再者，竞争未必只局限于互相争夺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只要存在着政治民主的体制，就不能阻止其他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建立它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拥有影响公众舆论的手段。从而，工人阶级的自发的政治行为减少，而其可以预测性加强，并且越来越被纳入法制结构之中。在这种结构内进行的斗争，其政治内容决定着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制度的稳定起什么作用。它很可能恰恰就是意味着，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工人阶级的愿望日趋一致。然而，即使如此，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轻易地废弃代议制民主体制，哪怕它正在慢慢地变得具有危险性。政治体制向独裁的方向转变，在各个方面影响着资产阶级中各个集团的利益。甚至在资产阶级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坚持实行一种对之有利的政治体制的派别，尽管这样做危及其整个阶级的统治。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中，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个人的政治权利基本相同。但是，没有哪一个集团，甚至统治阶级，有权或掌握这样的手段，即可以通过全然为本集团利益服务的组织或舆论手段对行使这些权利施加影响。因此，所谓行使政治权利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仪式而已。形式上存在着的代表机构只不过履行一种象征性的功能。统治阶级没有必要通过任何一种政治代议制来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并不是以其在私营经济部门中所处的地位为基础，而是以其在国家行政等级制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为基础。这种等级制度废除了经济的私营性质。当然，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行政等级机构中各

级和各个部门的利益集团，为了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断相互斗争。然而在正常情况下，至少就我们所能作出的分析而言，苏联模式的社会体制结构，使得破坏行政等级制结构的统一对任何一个集团来说都是不利的。

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集团，如果要脱离行政等级制机构，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而存在，它就不仅要遭到统治阶级中其他集团的反对，而且在对付被压迫阶级时还会处于不能自卫的境地。例如政治领导人的庇护不仅意味着对生产和服务性企业中经理们的约束，而且还意味着对工人的防范。高级经济管理部门保证使工人的“正常”要求始终能够得到满足，并可以调动足够的力量来打消那些“过分”的要求。在正常情况下，低级管理人员至多只不过是希望行政等级制机构内部的决定权非集中化，而并不希望统一的等级制机构遭到破坏。

只要保持行政等级制机构的统一，被压迫阶级就不能为其本身建立独立的组织基础，因为它始终受到整个体制的、统一起来的压力。从我们的模式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尽管统治阶级的两极分化，是一支社会力量将其本身组织起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根据这种制度的总体结构却推断不出任何这样的发展趋势，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发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增加了。

尽管如此，这种制度的结构并不排除出现使统治阶级的统一遭到动摇的危机形势。正是在发生这种危机之后，才演变出现代这种形式的苏联模式的社会，这也就是我们的模式阐述的主题。在紧接着斯大林逝世之后开始的过渡时期中，

自己也受到大规模恐怖威胁的那部分统治阶级，也要废除这种恐怖活动，他们至少几次设法动员统治阶级以外的集团来反对那些直接参与实行恐怖的、老的权贵。这样做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结束斯大林式的大规模恐怖，符合所有主要社会集团的基本利益。可是，这场实验也触发了潜在的革命进程，它威胁着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在有些国家中，只靠军事手段才制止了这个过程。

由于发生了上述一系列的震动，统治阶级又恢复了他们的政治统一。再也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敢于进行一次实验。在通过克服这次危机而扎下了根的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体制中，没有一个统治阶级集团的利益是和广大社会阶层的愿望一致的。这些矛盾不再象为结束大规模恐怖而斗争时期的矛盾那样简单、明确，当时全体“人民”都起来反对一个狭隘的政治权贵阶层。现在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根据自己的局部利益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作为主要力量的低级经济管理人员和政治领导人，他们的目标是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力和在为高级决策作准备时扩大自己的发言权。对群众来说，其后果不再仅仅表现为结束日常生活中的动员，或表现为相对地不断满足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而表现为不断扩大的社会差异，以及在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方面出现的不断扩大的差异。因此，很可能低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将逐渐符合来自于我们的模式的格局；它们将有意识地使自己适应等级制结构非集中化的发展，并不同任何破坏等级制结构统一的企图发生联系。

因此，不能指望苏联模式的社会发生新的危机，即斯大林

主义之后的既存制度本身的危机，会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动。统治阶级中发生的任何新的分裂，如果能发生的话，则只能设想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危机的结果。这场危机或是导致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制度发生经济崩溃的结果，或是导致被压迫阶级反抗能力的加强的结果，再不然就是导致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制度不再能适应外部条件变化的结果。就后一种情况而言，预见到会发生这类变化不是提出抽象的模式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任务。至于前两种可能性，按照我们的模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预言，苏联模式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崩溃。根据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和工人家庭状况的改善，我们能够就被压迫阶级相对自治的发展提出某些谨慎的预言，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从我们的模式中推断出这种倾向将逾越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制度所能容忍的限度。然而，从我们的模式中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再次爆发一场类似过渡时期发生的政治危机，它将在更高一级并以更加不同的形式发生。由于非集中化的结果，统治阶级更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意图。统治阶级中的有些集团已经习惯于更加独立。在低级知识分子的亚文化群中，已经存在的、对立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发展，在适当时机，它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非法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会具有某种重要性。工人家庭中的积蓄越雄厚，为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一代工人阶级的各个集团中涌现出并巩固各种不同于官方的思想，就留有更大的余地。

以上分析难道还不够充分吗？当然不够。因为斯大林主

义之后的发展仅仅是个开始，并且关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一种独特的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可引用的先例。人民（对他们来说，两种制度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会这样说吗？他们能够提出，为什么东欧没有组织起来的、革命的或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这样的问题吗？他们能够说明，为什么统治阶级成员只能通过他们在行政机构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通过独立的政治组织来实现其个人利益？他们能够说出知识分子的异端邪说的社会基础吗？他们能够认识到提高群众消费水平的潜在的可能性吗？他们能够解释经济周期的特殊动力及其特殊的政治影响吗？如果不能的话，左翼就必须抛弃他们的趋同论观点，必须进一步详尽地阐述关于作为独特的阶级社会的、苏联模式的社会的理论。

五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所走过的弯路

迄今为止，苏联模式的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够在任何事情上，而不只是在重要的或不重要的理论细节上与官方马克思主义决裂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能够承认连它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和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相同。要承认这种社会基础不可能相同，就得首先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模式的社会看作地地道道的阶级社会，并应该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原理之所以构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而已。在东欧总是不时地出现非官方的，乃至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他们的信念牺牲了自由，甚至献出了生命。但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认识到，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可能达到（甚至在次要的意义上）说服和争取统治阶级的目的。甚至那些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批评官方政策的人，事实上是在同官方对话，而不是在同工人阶级本身对话。

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是通过事实上由官方意识形态垄断的机构和机关这条渠道进行的。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全部发展的特点，看来是不会错的。这一渠道无法疏通的任何事件一般仍停留在个人行动的水平上。甚至那些既无法通

过官方机构也无法通过个人反抗来发泄的力量由于过度而爆发为自发的集体行动，也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事件。这些行动没有导致建立可以使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形成的阶级觉悟彼此发生联系的自主的组织形式。

乍看起来，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官方机构内部找到社会基础。而事实上给人的印象是，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同社会主义传统有联系的官方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口头上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其一部分的较深信仰。因为恰恰是在有可能采取独立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时期（俄国是在二十年代，东欧则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改革时期），官方受到了派系斗争的震撼。这些派系斗争明显地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利益实际上是（不太明显地）支配这些利益的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利益。而派系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官方内部围绕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的各种倾向都自诩为对意识形态传统作出唯一准确的解释和运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种怪事的出现，即为了寻找独立于官方的根据，反而投入到官方内部进行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去，这岂不是把关系弄颠倒了。似乎同官方决裂就意味着放弃对社会进程施加实际影响的机会。乍看起来，似乎施加某种实际影响的唯一方式就是参加官方内部的意识形态辩论，即使这样做难免要作出各方面的妥协也罢。

行政机构的马克思主义

在震撼世界的革命和内战中诞生的这个社会，同吸引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去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毫无相似之处。尽管下面讲的全是事实，即以以前的统治阶级全部被消灭了——贵族和大地主从俄国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资产阶级本身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即使新经济政策的经济自由主义也不能使它复活，然而，阶级敌人并不是唯一要予以消灭的集团，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真正基础的城市无产阶级也被消灭了。在俄国的城市中唯一能够起作用的力量，就只剩下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行政机构了。它的组织原则使社会各阶级，包括以它为中心的新的统治阶级都不能作为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势力。这个行政机构不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变革的产物，而是这场革命本身的产物。

在二十年代，行政机构尚未把它的权力扩展到整个社会。革命和内战使农村完全成为另一个社会。经历了大变革的农民是作为一种自主的经济力量出现的。在对土地重新进行分配以后，农民关心的主要是其自身的事情，把精力全部放在了一些本乡本土的问题上；城市各阶级的瘫痪使得农民根本不可能超越村社的范围而以其他形式重新组织起来。但在农村，农民掌管着一切。党没有能够扎根于农村，中央行政部门的地方机构也没能够从在革命的烈火中重新活跃起来的村社手中夺取权力。即使是对中央政权当局最轻微的打击都足以使农民能够利用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优势而成为一支独立的

政治力量。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紧张关系,使这种政治威胁具体化了。土地所有权的民主化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农民对自己产品的消费量。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再加上由于战争和工业的彻底瓦解所引起的农业生产的下降,就使得城市居民经常受到饥荒的威胁。

行政机构和它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命运,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克服革命后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多样性。行政机构可以使农民保持中立,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暂时运用生产的正常市场渠道,至少可以保证供给城市居民以部分食物。在这段时间内,行政机构能够或者建立起经济基础,以实现它对农村的优势;或者通过暴力把它的权力扩大到农村,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保证工业化所必需的积累。

二十年代,老一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不断地在上述这些选择中进行探索。他们始终是把维持生存、巩固政权与保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两个目的联系起来考虑的。他们很清楚,如果统治机构找不到同商品生产者的农民实现妥协的办法,这个社会就会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是从行政机构的角度,而是从一种想象中的、工人阶级的角度来对待生存的问题的。他们希望给予庇护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官僚阶层的阶级政权,希望使其不受发展小商品生产的影响。他们希望社会主义既不受小商品生产得到巩固的影响,也不受官僚主义机构自主的影响。当他们实际做到的是探索建立将领导社会的单一的等级制机构的前提条件时,他们又在拼命抵制在巩固这一成果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时,布尔

什维主义的另一个变种——行政机构的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形成。它在理论上和道义上都更肤浅，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却更重要。行政机构从来没有机会抛弃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并创立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教育和宣传机构，以及在选拔干部的体系中，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制度化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就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忠。但是，无论如何，行政机构对埋葬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兴趣。布尔什维主义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符合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系统中的各机构和集团的利益。首先，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抨击官僚主义，但在苏维埃政权确实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某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的专政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此外，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明确表示致力于发展工业；因此，它制定了广泛的发展路线，只要行政机构要建立其对农民实行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就必须遵循这些路线。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一个将农民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形象，至少是初步指出了政府可以期望从农村得到些什么以及如何使农村中立化。

不管行政机构从布尔什维主义当中得到的是什麼，其中最重要的既不是从意识形态上为它的权力进行辩护，也不是为它确定了社会经济总方针，而是磐石般的完整的组织原则。由于城市里各个阶级的腐蚀和农民只能自己顾自己，所以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构成从外部推翻领导机构的威胁。相反，危险却来自内部，或者由于最高领导层发生分裂，或者由于直接接触人民群众的下级官员拒绝执行不得人心的政令。当然，由于所有个人的意见分歧都必须服从于党的组

织的统一，布尔什维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统治机构发生崩溃的危险，不管这种危险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然而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就是产生持不同政见活动的 一个源泉，这种活动必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准则的无情的镇压。工人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的左翼反对派，布哈林反对派——这些集团在党的领导层中不断地在形成，究其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它们想实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则：把权力直接交还给民主机构，由工人阶级自己，而不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在党内恢复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些愿望使统治机构的利益不断受到威胁，即使这些愿望在行政机构之外不再有任何广泛的基础，但它们却形成一种会使行政机构从内部发生组织分裂的威胁。行政机构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布尔什维主义，即它不会引起麻烦。行政机构需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它不要求在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政策之间，或在“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政策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而是对当权者所采取的任何一项实际措施都给以支持。

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要是行政机构通过粉碎相继出现的反对派，使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它的需要这样一种过程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更恰当地说，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一过程的方向只是到后来才变得明朗化的。在派系斗争中形成的各种理论见解，对大多数参与斗争的人来说，仅仅当作是把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处理革命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但行政机构则是利用这种理论传统的某些部分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并完全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在政治上败坏自己敌人的信誉。然而，这些都是逐步实现的。当人们认识到这不只是一连串的特殊手腕，而是一种前后连贯的制度时，已为时太晚了。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面前进行批判性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况且在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斯大林的反对者已经失去了获取权力的手段。

列 宁 主 义

起初，布尔什维克只是希望当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忠实信徒；他们想尽可能忠实地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的革命工人运动的特殊情况。甚至在后来，他们在政治上同这一学派决裂之后，也没有想到要从理论分歧的高度来阐明他们同这一学派的实际对抗。他们宁可把这种对抗看作是他们过去的老师个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的结果。然而，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把普遍的理论传统运用于一种特殊情况的时候，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地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不可能符合落后的俄国任何革命的工人政治，那就是下面这个主张所认为的，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程度之间存在着明确无误的因果关系。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容易利用这个主张来为改良主义——一种消极等待的策略，以及为此需要而搞组织建设进行辩论。从逻辑上讲，即使这些做法没一条是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仍可为之

辩解，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可以用来确定把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标准。然而，就落后的俄国而言，结论则是一致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产阶级不会成为革命的阶级。

布尔什维克竭力借助于革命具有国际性这一概念来摆脱这种令人气馁的结论。他们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民族经济的集合体，而是一个世界体系。因而，无产阶级革命解决的对抗不是单独一个国家中的，而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指望这些对抗能打破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锁链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内部矛盾，由于全体居民从对殖民地的剥削和不平等交换中得到了好处而缓和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实行现代化有困难的地方所产生的对抗使雇佣劳动同资本之间的冲突激化了，从而在这些地方更容易爆发革命。诚然，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比西方工人阶级弱小，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弱，它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更缺少活力。这类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这场革命。因而，这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既然如此，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后就停止前进，它必须继续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共同点。

但是，尽管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动力的观点是十分非正统的，他们也从未想到要把它作为修改“正统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依据。他们宣称，世界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落后

的国家。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落后的国家会在一个自主的社会基础上实现自主的革命。对他们来说，俄国革命的唯一目的是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如果欧洲的工人阶级对这个信号作出反应，则俄国革命就会巩固，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使它的经济落后状况得到改善。否则，俄国的革命就会失败或者倒退。但是，无论俄国革命的命运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它的任务都是建立一种西方业已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当然布尔什维克很清楚，农民由于在人口上和经济上的分量而在俄国革命中和在革命以后的过渡时期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使农民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也没有想到农民经济及其生活方式在必须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起任何建设性的作用。

一九一七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在世界革命动力问题上的观念，使他们能够把“正统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革命工人运动的理想统一起来；一九一七年以后，这个观念又使他们能够把“正统马克思主义”同苏维埃政权的“不规则”的特点统一起来。他们能够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实际范围，限于宣布和平，分配土地和承认民族自决权。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允许搞私人生产。他们在实践中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只要他们能使自己相信，他们作出的每一个新的让步都是为了延长苏维埃政权的寿命。直到在欧洲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为止，到那时，在紧接着出现的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他们将取消他们作出的所有让步。由于期待着发生这场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忽视了革命以后现实中的阶级体制和

结构。

列宁的思想依然完全保持着实践上的现实主义和理论上的正统性。当列宁谈论苏维埃政府采取的措施时，他总是坦率地阐明自己的意思，并且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中对于这些措施所包含的危险是一清二楚的。在他看来，这种危险就是（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崩溃，资本主义有可能复辟。他完全没有想到，统治机器的政权可以在一个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理论传统中的公式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这等于是复辟资本主义。他说这话时从未想到，俄国社会的发展会偏离无产阶级革命所开辟的航道。列宁说，我们可以完全心平气和地承认，通过开放市场，我们在复辟资本主义，因为是在开放市场。在无产阶级国家控制之下运转的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中运转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苏维埃政权发现它被迫把恢复生产和分配的正常运转的任务交由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去完成，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其自己的防御工事，也就使得苏维埃政权免于崩溃。因此，尽管列宁经常把这叫做复辟资本主义，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把它说成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支柱，一个比战时共产主义优越的工农联盟的新形式，这并不奇怪。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当然认为，对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实行开放政策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列宁坚持如实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后果，为的是使党能够自觉地同这些后果进行斗争。但是，他这一立场的重大弱点是，他不能解释苏联社会发展的“不规则性”和国家政权的“畸形”之间的联系。每当他不得不说明，在社会经济方面对无产

阶级专政的危险是什么时，他总说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加强；每当他解释什么是在政治方面的危险时，他总说是国家的官僚主义化。然而，他又说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官僚主义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削弱了，它本身已不再能行使权力；第二，苏维埃国家除了把沙皇的官僚主义及产生它的条件接受下来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第三，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官员们没有受过进行统治的训练和缺乏经验，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从沙皇制继承过来的行政机构。这三条理由当中没有一条同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关。相反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必须向资本家学习他们的有效的领导艺术，必须把有效地组织经济的任务，只要可能就交给资产阶级企业家去完成。他有一次甚至走得这么远，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才会使俄国产生现代的无产阶级。当他想到资本主义的加强所带来的威胁时，便想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当他不得不对付官僚主义化时，他又试图彻底依靠私人企业。

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列宁把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日益独立的现象看做是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学问题。他可能清楚地看出了，行使权力的不是无产阶级，他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掌权，又是哪个阶级呢？尽管如此，他还是绝对地相信，即使不是工人阶级在实行统治，政府还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最高权力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的“老近卫军”，也就是职业革命的杰出人物掌管着，他们是不可腐蚀的并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如果他们一直到发生世界革命时还在掌权的话，俄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出问题。

据列宁看来，问题似乎在于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意志碰到了行政机构组织上惰性的抵制，而他们颁布的政令则陷入官僚主义的迷宫之中。列宁从来没有想到，行政机构竟会制服政治领导人。列宁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实际上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对上面颁布的政令抵制越甚，就越需要“老近卫军”（据列宁说）维持表面上的团结。只有极为明确无误的团结才能使“老近卫军”拥有必需的不容置疑的权威，使他们不顾天大的困难，把自己的意志强行贯彻下去。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把最高领导层中的政策分歧泄露出去。

根据党史的传说，恰恰在列宁病逝之前，他正准备向斯大林发动全面进攻，因为斯大林威胁着领导层内部的民主，只是由于列宁“在最糟糕的时刻”病倒，才使得他没有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实际上，列宁没能找到这样一种立场，使他能够前后一贯地开展反对斯大林所代表的政治现象，而不是反对斯大林个人的斗争。不论列宁个人是同情哪一方，毋庸置疑的是，他交给斯大林的武器同他交给托洛茨基的武器一样强大（如果不是更强的话）。但是，关于“老近卫军”的神话使他个人暂时能够在“求生存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之间，以及在实际上的现实主义和理论上的正统性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

随着列宁的病倒和逝世而进行的权力之争打乱了这种平

衡。最高领导层分成两派，日益受孤立的少数派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种可能性：行政机构的社会学机制可能迫使纯粹的无产阶级原则受它的支配，甚至在“老近卫军”当中也是如此。在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可能已经看出，在“老近卫军”磐石般的权力中已出现了党的官僚主义化的征兆。发生的变化事实上更富有戏剧性；托洛茨基被迫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俄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间接地影响到国际革命运动。到二十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各成员党相继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托洛茨基清楚地看出，这些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同在俄国指导下制定的共产国际的总政策有关。托洛茨基开始看到，将要到来的世界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不再简单地是外部的先决条件；如果要使世界革命从客观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话，必须改变俄国本身的发展。

从这一点出发，诸如不管是哪一种“畸形”和“归根到底”等等之类的公式统统没有用了。无论如何这至少意味着，这些公式已不再能妨碍寻找那些征兆背后的原因了。于是乎，“官僚政治”不再简单地意味着“官僚主义”，而是一个根据统一的路线组织起来的庞大机器，它独立于社会各阶级，并使整个社会都从属于它。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一种能阐明社会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就有可能了。为了说明这一理论，托洛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在对波拿巴主义的国家进行分析时的一些原理。开始时，他仅仅引用了马克思的最一般的分析方法，用以说明国家机器日益独立的原因是它在各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城市阶级和农村阶级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但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类比的方法。和马克思

一样，托洛茨基也从同样的两个假设着手。第一，能够在政治上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各个阶级被缩小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第二，于是权力机器利用这种形势，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一种代表者，它代表着一个无力进行政治活动的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需要得到政治保护以免遭独裁国家的侵害。在执行“新经济政策过头”时期，托洛茨基已经有了这样的印象：苏维埃的官僚政治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利益的政治代表，而在经济上和人数上都比较弱小的无产阶级却无力贯彻自己的意志。

托洛茨基的上述观点直接导致了他的实践纲领：必须改变工农业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城市无产阶级通过党和各级委员会再次控制国家机器。他建议，即使不能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至少也应该把流到农民生产者那里的剩余部分拿过来，用以加快工业的积累。

无疑，托洛茨基的纲领的最大弱点是，他找不到一股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它能够并且愿意实践他的纲领。托洛茨基起初主要以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为对象，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是，这个打算命定地失败了。他自己对革命后的形势的分析也说明，工人的基层组织太弱，不能抵制国家机器的控制。显然，托洛茨基不会想到去依靠农民。于是他只能寄希望于在那些仍保持着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国家机器的部门中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当他在基层组织中遭受挫败后，他不得不再次试图在国家机器的最高机关中寻找支持者，而他的纲领的目的本身却又是想要打破这个国家机器的磐石般的权力！

但是，在因绝望而引起的这种实践上的前后不一致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理论上的前后不一致。托洛茨基之所以希望通过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来强化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把工人阶级看成仅仅是经济统计学上的范畴，而不是一种经过它自己的实践已经有了觉悟的政治力量。在他看来，一旦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影响增长了，它自然就会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水平。他没有想到，除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影响之外，历史的进程、这种新型工人阶级赖以形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工人阶级自己的实践经验，都是同等重要的因素。他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也并不怀疑，现存的体制，按照它最初的功能，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苏联工人阶级为了达到高度的组织水平和阶级觉悟，不再必须在长期的斗争、错误和失败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因为苏维埃政权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苏联工人阶级所要达到的这种组织水平和阶级觉悟。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认为有可能通过实施一项设法限制国家机构权力的纲领来寻求国家机构的支持的更深刻的原因。他把官僚阶级看做不仅是一个根据自己特殊利益而活动的特权集团，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充分的阶级觉悟的和与此相应的组织的代理人。这就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以后，在理论上又陷入了困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国家机构摒弃了他的纲领，而恰恰是由于国家机构实行了这个纲领。

布哈林对农民说：“你们要使自己富裕起来。”说这和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有相似之处似乎有理。但是，几年之后，这个政权来了个急转弯，残酷地压榨农民，并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工

业化计划。使托洛茨基多少感到慰藉的是，尽管象发狂似地搞集体化和工业化，当时实行的还是他自己的纲领。无论是消灭农民的小片耕地也好，还是创建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好，都没有动摇国家机构的权力。结果反而使国家机构把它的霸权扩展到过去它只能使其孤立和中立而不能直接控制的那些社会部门中去了。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波拿巴主义的国家依靠的是一个由于被缩小而不能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社会阶级。在这次急转弯以后，苏维埃国家显然不再需要这种基础。现在是国家本身在缩小各社会阶级，包括象无产阶级那样的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水平上没有被缩小的阶级。

从三十年代初以后，托洛茨基再也不能在苏维埃社会及其经济的实际发展之外，提出一套发展纲领了。他同样再也不能够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统治机构的权力扩展到了各个领域。他只能在两种同样都会使人误解的预言中间徘徊：他有时预计苏联的发展会导致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有时又希望，要不顾一切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失利，在理论上被击败的时候，国家机构自己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则变得前后一致起来，并日益重要了。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出现之前进行的政治大辩论包含了老布尔什维克的各种理论立场之间的对抗。在这场大辩论中，国家机构的作用限于执行已被正式决定的组织结论。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使国家机构中大批无名之辈第一次出头露面并起主导作用。国家机构通过宣传机构和玩弄组织各种手腕来给大辩论定调子，并决

定了大辩论的结果，这是第一次。那些起来反对托洛茨基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只不过是这场大规模宣传运动的参加者。他们所做的恰恰就是党报雇佣文人所作的（尽管可能是在“更高一级”这样干）：从列宁的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言论中挑选一些用来反对托洛茨基，并把事情说成仿佛两种既密切相联又互不相容的体系——“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进行殊死斗争。他们不惜篡改历史，以说明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早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他们泰然自若地把托洛茨基从未有过的观点以及连想也想不到的活动都加在他的身上予以谴责。

但是，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还是小心谨慎的：设法不让他们提出的、构成“列宁主义”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概念同列宁的许多为人所知的著作发生矛盾。只有斯大林在这点上能肆无忌惮地把一些同列宁公开发表过的观点完全格格不入的思想说成是列宁的思想。托洛茨基声称，世界革命越是推迟发生，苏维埃政权结构就越要悲剧性地畸形发展；于是乎斯大林就大胆地盗用列宁的权威，提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在那一点上仍是斯大林的有影响的同盟者）以圣徒般的惊恐谴责托洛茨基的这种异想天开的异端邪说。这次事件预告，不是别人而是斯大林，将被人们呼吁一劳永逸地毁弃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传统。但是在这方面，斯大林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大辩论中并没有起重要的作用，而是布哈林承担起把政权当局反对托洛茨基的纲领系统化，并为这个纲领进行论证和辩解的任务。

布哈林的想法清楚地表明，国家机构的利益不仅对这场

辩论的形式，而且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二十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当时还不可能争取国家机器实行一项既压制托洛茨基关于民主化的要求，而同时又把他的经济纲领接受过来的政策。官僚阶层不仅把加速工业积累看作是一种想象中的危险：无产阶级将再次成为自主的政治力量，而且还把它当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失去农民的忠诚（这是化了很大代价才赢来的），并使农民失去生产的积极性。国家机构十分害怕它不能直接加以控制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未知因素的农民。国家机构认为，通过市场来建立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并摒弃任何干扰市场平衡的冒险企图，这样它就能够同农民和平共处。国家机构需要有一种能够阐明由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社会休战局面可以永远保持下去的思想，而布哈林恰恰为它提供了这样的理论。

布哈林的论点是，如果为了积累而破坏市场平衡，农民将转而反对政权。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类措施。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让市场自由地建立工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富农在被和平地吸收进社会主义之后，也就不再存在了。富农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的企业家。国家只需使富农在参加消费合作社、商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样，不管富农的政治信仰如何，他都会加入一种合作社体系，从而驯服地从属于集体经济。

国家机构害怕农民，而布哈林告诉它说，只要让农民富起来，它就可以同农民和平共处。国家机构想尽量推迟同农民发生对抗，而布哈林告诉它说，它可以避免发生这种对抗。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与国家机构喜欢听的话不一致时，

布哈林就不作任何说明地抛弃这些传统。然而布哈林并没有同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决裂。国家机构(它的意识形态是布哈林提供的)尚未彻底征服社会,因而还在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同一个不受其支配的阶级的可预测的行为相适应。布哈林的预言是按照国家机构的意愿提出来的,而不是在对阶级关系进行了分析之后提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他的预言是用社会—经济的术语,用阶级的语言来表达的。决定性的转折,只是在国家机构决定以武力来破坏农民的社会和经济自主权时才到来。

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当新的粮食征购危机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时,下面这点才看得清楚了,即只让农民致富还不够,因为这还不能保证城市得到粮食供应。因此,国家机构担心会出事,如果允许农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农民实行强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市场平衡的美景再也不能使他们放心了。于是斯大林时期开始了。

布哈林曾说,社会主义的力量越强,富农被和平地吸收进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斯大林则说,富农的反抗是同社会主义的巩固成正比的。他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小麦,那是因为富裕的农民想使城市挨饿。从眼前来说,必须强行征购粮食;从长期来说,国家将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至少必须把农民的某些小片耕地重新合并到集体的农业组织中来,只有机械化的生产这种类型的农业组织,才能大规模地、充分地发展经济。因此需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从而也就需要发展重工业。因此,有两件事必须做到:使农业集体化和加速工业

积累。

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个表现得兴高采烈，并加入了斯大林阵营，这毫不奇怪，因为上面提到的经济和政治结论都是他们提出过的，但他们对斯大林提出的前提并不感兴趣。这些前提的确有些令人吃惊，因为它在理论上已肯定地同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彻底破裂。斯大林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论据：根据现代人口统计情况和工农业技术发展的特定水平，农民市场和农民的小片耕地没有能力正常供应国家食物。相反，他却捏造事实说，富农分子正在组织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了。斯大林认为，所谓日益增长的富农的反抗是一个阴谋，是由一股暗藏的势力搞的阴谋。这个社会集团的行为不是由扎根于它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公开的利益所决定，而是由暗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内奸所决定。它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活动，而是作为一个“阶级敌人”进行活动。

只要把秘密组织，敌人的宣传和破坏活动说成是社会行为，各阶级之间的界线就失去了理论重要性。富农并不是唯一的敌人：地方官员在他管辖的村子里征集不到中央机关计算出来的那么多的粮食，他可能也是一个敌人——至少是敌人的帮凶。敌人的帮凶还有很多，比如说，工程师，他的拖拉机厂达不到上边要求的过高的发展速度；经济学家，他说过把国民生产总值用来投资的那一部分不能超过用于消费和再生产后所剩余的那部分；以及完不成提高后的定额的工人，他们都可能是敌人的帮凶。与阶级敌人是同谋的关系也罢，对敌人表示怜悯也罢，或者对敌人缺乏警惕性也罢，怎么说都没多大关系：凡是达不到官方对他的期望的人，他就是一个大阴谋的参

加者。对待人或事物是以警察的观点代替了社会—经济的观点，针对各个阶级所采取的措施，是警察措施，而不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措施。最后，那怕是口头上，也不再需要同任何阶级联系起来，它们简直就是“阶级敌人”，“孟什维克挑衅者”，或者“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的代理人”。

斯大林主义是转折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转折的过程中，国家机构以武力把它的统治扩展到它迄今未直接加以控制的社会各个部门。国家机构对预测各个独立的阶级的行为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所有的阶级都服从于它的统治。重要的是伴随着改革而产生的冲击不要瓦解权力制度。必须要有系统的大规模的恐怖，以致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做梦也不敢想再进行反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直到那时为止，由一种自命有预见性而且多少还起点作用的阶级理论变成了一种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的实行恐怖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圣典化

随着阶级理论连同它的颇为自负的预见性一道消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便把荒诞的宇宙论和一般的方法论圣典化。在东欧，这两论直到今天还决定着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体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内容的枯竭，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便在那个用来证明（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是正确的意识形态中日益得势。二十年代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一般哲学问题上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列宁认为，一般的哲学问题在捍卫布

尔什维克党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方面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试图从一种辩证的方法论或宇宙论中演绎出党的实践战略。他们的实践方向是根据对俄国社会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分析，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决定的。只是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被抽掉了它的内容，而“辩证唯物主义”又被圣典化之后，被认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属性的一般的自然哲学和方法论才取得了直接的政治重要性。

在东欧国家中，每个大学毕业生或参加过党的学习班的人，都很清楚“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教条的内容；在西方它也并非不为人们所知，尽管在西欧各国党的教育和理论工作中，这个教条从未居于比社会理论优先的地位。对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教条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总有人——主要是西方知识分子中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新信徒——感到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怪诞性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吸引力；他们的思想越没有意义，越原始，他们就越是确信，他们已经同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文化决裂了。这只是把过去的悲剧当作闹剧来重演一番。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论是有系统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伴奏。始终支配着矛盾的统一性的、各种矛盾之间的斗争，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提高到宇宙规律的高度。总是发生“飞跃”的量和质的辩证法，把为平衡经济和对外政策，不顾信义的实用主义的需要而发生的政治转折美化成为宇宙的必然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只不过意味着把含糊其词的东西提高到系统的原则高度；它是把（苏

维埃)政权通过的一个个单独决议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象征性地联系起来的一种方法论。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任何一项明显违背社会主义目标的措施,“归根结蒂”可能只符合这些目标。如果谁不执行这些措施,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在“客观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当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普遍适用的规律的一个特定例证,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看来就象是自然界的必然。对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的审查,对行动的各种可能性的选择,对所发生的事件应负的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从社会实践中一笔勾销了。实践被降低到适应需要的地位,尽管这并不排斥下述可能性(每个有点“辩证法”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点),即有可能发生各种适应需要的问题。这些都是以自觉需要的名义,必须尽可能地以激烈手段予以解决的问题。

由国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这座宇宙论和方法论的大厦,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但是,如果因此推论说,这种作用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论点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把它变成一种宇宙论并非是绝对必要的。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社会实践,不采用黑格尔的任何观点,而用象布哈林所试图提出的那种更现代的和科学的概念,在原则上本来可以更容易地加以详尽阐述。在这样一种概念中,也许可以包括急剧转折的必要性(不过,不是布哈林的教科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的均衡论理论与他的政治纲领太接近了)。事实上,从警察的观点来观察社会的原

始阶级理论,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而是用符合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宇宙论来加以补充。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大辩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就已完全形成了,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它相对地独立于派别斗争,尽管这场辩论本身不是以一种公道的学术的方式进行的。在发生转折之后,“辩证唯物主义”被改造得适合于新的政治口号,并且被用来作为一种基本理论。而在以前,“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只与教育和科学有关。

在教育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决定的,它产生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传统(主要是列宁的哲学著作)。其后是由在斗争中哲学所起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决定的。通过这种斗争,国家机构把它的权力扩展到了科学和文化生活中。

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的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的年代。在这段时期,当政治上已经相当激烈的争论威胁着被削弱了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统一的时候,列宁极力强调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任务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只有间接关系)的抽象的哲学问题。这种奇怪的态度引起了某些列宁同时代人的注意,但至今没有人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要求对当代的资料进行严肃的、批判性的分析,因此让我们限于提出一些谨慎的假设。

总的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直到二月革命后发生的两极分化时为止,从未想到他们最终会分裂成两派。只是在二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才发动群众反对他们各自对手的政治组织,以夺取被对方占领的政治阵地。以前,分歧只不过是革命积极分子忠于这个或那个领导者集团的间

题,是在这个组织中参加哪个派别的问题,或者是就策略和纲领问题进行辩论时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这个组织中的两派在开展群众工作时,都忙于扩大和保持它们在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基地。甚至到了一九一二年,当情况好转以后,群众运动还是自发的,并没有得到任何一派组织的领导,因而也就没有反映这两派在策略上和纲领上存在着的分歧。两派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和不同的选举口号,但是,是它们共同敌人的优势力量,而不是它们纲领之间的分歧,决定了这些当选者的行为。一般说来,参加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注意不把他们小集团的内部分歧扩散到公共场合去。

在这些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派就一些不会产生政治后果的抽象的理论问题,提出多少是正式的观点,这样做从几方面看都可能是有用的。首先,从人数来看,党的群众基础存在着弱点。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政治观点来看,控制大批群众(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这是当时工人运动的骄傲)比对一般的哲学问题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更重要。这可以使这个政党把那些对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的居统治地位的哲学传统陌生的那些社会集团的一部分人争取过来。在这类政党的实践当中,不是哲学的正统性,而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阶级坚定性,以及工人运动与代表对立的社会利益的敌对组织的关系,保证了政治上的不妥协。布尔什维主义当时没有这种社会学的保证,它脱离群众,组织上也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最抽象的哲学问题对保持党的阶级任务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事实上有一种担心,就是“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这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已经

变得时髦)的企图,可能导致在社会学说中得出对党的实际方向产生灾难性后果的结论。其次,一种正式的哲学观点的发展,对布尔什维克派为争取具有自治的特性而进行的殊死斗争可能起到某种作用。人们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策略和纲领,然而,人们却总是能够紧紧抓住同实践没有直接关联的哲学观点不放。

不管上面提到的这些假设正确与否,事实是,列宁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包含一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知觉理论和方法论;对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分子来说,接受还是拒绝这些观点不是个人的事。这一点对革命以后的苏维埃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要求树立某个特定的哲学学说,成为布尔什维克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象征性地对布尔什维克思想传统表示忠诚——是不能拒绝这种要求的。有必要对上述要求所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加以解释,得出的结果的提法一定要使这些结果能毫不含糊地用于教育和宣传方面。二十年代,在执行上述任务中,许多重大分歧依然不时地出现,尽管没有人对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体系提出异议。当时形成了两大学派,即“辩证论者”学派和“机械论者”学派,两派为垄断官方哲学展开了斗争。

传统对两派的斗争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列宁的《哲学笔记》和恩格斯某些手稿的发表,有利于“辩证论者”。其他因素对“辩证论者”的胜利也起了作用。国家机构只能逐渐地扩大它的权力,甚至在文化和科学生活领域也是如此。最

难以加以控制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公开表示支持苏维埃的统治，因此，他们感到有权利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与新社会相适应的科学和文化自主地加以阐述。国家机构不能把政治纪律简单地强加于左翼知识分子身上；如果国家机构想取消知识分子的自主权（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它必须对特定的文化和科学问题加以干预。官方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国家机构的干预进行辩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哲学，从这个前提出发，它对一切科学和文化问题都有特定的立场。因此不言而喻，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教义的积极继承者的党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

“辩证论者”也从这种观点中得到了好处。他们的对手——“机械论者”，只是要使科学的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他们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是科学的最新发现构成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而“辩证论者”则从这样一种前提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黑格尔那里吸收过来的“辩证法”具有普遍的权威，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当代科学的真正重要的发现，是由于它们的发现者遵循了（当然是不自觉的）这种辩证的方法。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不自觉的，所以在哲学问题上他们往往仍是唯心论者——这不仅在思想上是危险的，而且还会阻止科学本身的发展。从而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接受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便成为必要的了。

于是，要适应国家机构的科学政策和文化政策的要求，这种做法本身就形成了所谓“辩证”的立场。在“辩证论者”与

“机械论者”进行的这场辩论刚开始时，后者力图提出一个具体的科学世界观，而前者仅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并反对对科学理论进行所谓的唯心主义的解释。渐渐地这两种立场颠倒过来了。“机械论者”采取守势，并力图证明，“辩证论者”提出的方法论的原则没有什么价值，不会导致任何结果。同时他们又极力证明，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许多方法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他们的逐渐占了上风对手却把方法论的原则变为本体论的原则。国家机构利用了辩论进行中的这一情况，因为它恰恰需要这样一种手段，使它能够随心所欲宣布任何理论是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无意义的，这一情况是一个肯定的有利条件；因为只有当政治上需要时才用得着这些论点，而且这些论点在逻辑上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含义。

在发生转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终于把适应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圣典化。但是，这种适应也不是尽善尽美的。首先，斯大林主义哲学所采用的那些哲学论点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偶然挑选出来的。其次，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含有某些非常令人不安的因素：如对黑格尔作了肯定的评价，为了克服这种评价的影响，还要不断地进行斗争。然而，最严重、最持久的紧张局势产生于这样的事实：虽然官方的哲学体系可以用来把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采取的最专横的措施说成是完美无缺的，它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极端唯意志论相矛盾的。这种紧张局势有时使人民为了捍卫某些科学和文化的价值免受国家机构的破坏而求助于“客观真理”。甚至斯大林本人晚年也玩

弄客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的矛盾把戏；他喜欢表现为似乎他对“唯意志论者”的过分行为不负任何责任。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被当成法典后，与这个社会制度有同样基础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看来在东欧就被永久地决定了。人们本来以为统治机构（它的权势彻底摧毁了构成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支柱的阶级理论）会把任何想在某些特定问题上恢复马克思主义以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实践作用的企图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到五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形态问题再次展开了辩论，在辩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一些内容再次得到了肯定。重点逐渐转向了社会科学，或者至少转向了社会哲学（甚至还有不少呼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自然哲学的思想）；还有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一切为恐怖辩解的东西彻底决裂，并且回复到它的源泉——马克思、列宁、甚至二十年代的卢卡奇。

斯大林逝世以后，政权出现的混乱局而使实现新的转折有了可能，当时，围绕在国家机器周围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正在瓦解，而这种统一长期以来是靠实行系统的恐怖来维持的。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大的集团想建立一种新的行政体制。这种新体制将不废除国家机构对权力的垄断，但它不是以实行系统的大规模恐怖为基础的，而是给下层统治阶级以更多的自主权。政治权贵中，那些同实行恐怖有直接牵连的人，当然竭力反对进行这些改革。而那些赞成改革并也想得

到权力的派别，通过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罪行来防止过去的权贵复辟。他们准备采取一切能采取的手段，包括允许进行公开辩论，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允许发表报道集中营情况的文章，赞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犯的战略错误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允许在经济方面对强迫实行积累进行批判，甚至鼓励并宣扬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攻击。在政治斗争加剧的时刻，要创立一种不再只是摆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准许得出明确的、有意义的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可能的。

揭示斯大林主义时代的阶级基础和权力结构并不符合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集团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这种重新取得了一种社会内容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试图通过国家机构同主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来了解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特点，并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持。甚至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即认为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历史趋向是把国家机构的权力延伸到各个阶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真的没有人提出过这种看法，这不仅是由于公开讨论这类看法会超出新的统治阶层为了巩固其政权所能容忍的政治限度。而且为结束恐怖制度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也认为，揭露苏联模式的社会中的阶级对抗，只会有助于保守势力和复辟势力。而且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把阶级对抗戏剧化来为恐怖制度辩解的。正因为如此，批评恐怖制度的人都坚持苏联模式的社会的社会同质性。他们对恐怖制度的批判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仍然存在的社会对抗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体制不构成任何威胁，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对

其实行镇压；国家机器应为社会提出一些可以使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趋于一致的目标，还应采取使它们的利益趋于一致变为现实的而且可以看得见的措施。

这种解冻的马克思主义回避基本的阶级对抗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利用这个机会接着干，至少在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被迫停止活动的水平上继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的原因。首先它所提出的社会目标比任何特定的阶级理想都更广泛。它详尽地阐述了社会理想的一个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可以被解释为每一个人，以至全人类都向往的目标，并把这些理想和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受歪曲的形象”加以对比。其次，解冻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现这些目标似乎是一个技术和组织上的问题。在东欧各国中，这些目标同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都不矛盾，而且统治集团的大部分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对那些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来说，改革是不利的，或者全然是一个威胁，因为将会提出追究责任的问题。和普通党员相比他们是少数，后者忠实地执行斯大林政府的指示，并且错误地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社会主义。因此，问题仅仅在于找到真正能够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

根据这种解释，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产生这种历史误会的基础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歪曲和滥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通常说的社会原因——落后、孤立及其后果——只是导致这种历史误会的火花。现在这些政策基本上已经停止实行了，改革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纠正错误——从思想上对这个制度进行自我批评。只有这种事后的

批评,才能对以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为其顶峰的哲学体系,充分进行唯心实用主义的解释。如果政治上的“歪曲”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错误造成的,那么这些错误必须是已经形成为理论的错误,而且这些理论也是非常有效和非常危险的。在实行改革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把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中每一个可能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方面抓住不放,进行抨击。

这些解冻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执着而认真地讨论了那些最荒诞的“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论的论点。这次他们关心的是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诸多矛盾中还有一些比较平和的“非对抗性”的变种,而且并非每一个渐变都必然导致“飞跃”。他们还把那些曾被用来为压制各种科学流派和倾向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一个一个地全部拣了起来。他们发现,他们所必须做的就是正确地解释这些论点,使得当代的全部科学都能容易地同“辩证唯物主义”协调起来。他们还极为一本正经地探讨一些琐屑的一般性问题,例如这样一些思想,即社会条件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并不排除存在着几种抉择,而且从中进行选择是可能的。他们搞了一套庞杂的解释和注解,用以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社会学的和政治的现实主义在伦理问题上并不含有玩世不恭的相对主义。

当然,即使最天真的解冻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大多数代表人物也知道,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思想清洗,或改变政治目标,或撤换死硬派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就可以克服被认为是由于理论错误所造成的社会后果。错误的政策还败坏了社会体制的形象。但这仅仅是个“形象受损”问题而已。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体制完全适应社会的同质性,因此,没有必要彻底改变

这种体制。改变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就足够了，恢复民主决定和民主管理体制也就足够了。而在目前的机构和组织结构的原则中，这些体制已正式得到了体现。不管这些批判的措词如何尖锐（进行这些批判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解冻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些从其形式上看来高度民主的决定和管理体制，甚至没有在形式上提供使社会上存在的真正对抗在政治上具体化的可能性。

地下马克思主义对抗 官方马克思主义

停止了系统的恐怖以后，社会上迸发出来的各种希望，助长了非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幼稚性。看不到在这种幼稚性当中含有真正的英雄气概是不符合历史的。正是这种英雄气概最终驱使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理由是这种批判的内在结构仍由受批判的对象所决定，即仍未摆脱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对传统进行系统的分析，对从前与斯大林主义对立的所有原则，重新进行思考。

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不再仅仅是一种途径，通过它可以找到对“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论的非人道后果进行权威性的反驳。重新确认行动自由和人们行动的责任性，不再仅仅是为了反对宿命论。后者把每件事都看作似乎是必然的，因而是有理的。从解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出来的新哲学，不再满足于有机会陈述关于人类处境的某

些真理(它本身并不重要)。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得出的这些真理,构成了一种积极的人类学和哲学—历史学的体系:人,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自由的社会存在。人的生物学属性及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特征,决定了保证人们生存的文化环境。然而这些只是消极的、限制性的条件。在这些限度内,人们通过相互联系的活动和在他人成果基础上的发展,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是,从哲学—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人类学的事实,呈现为一种可能性,它是一个长期进化过程的结果。在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中,社会的进化不是由人类自由选择的、自觉调整的那些目标所决定的。在这以前的社会进化的结果是作为第二天性支配着社会。只有在目前,在历史的现时,才出现了人类自觉而集体地控制他们的社会生活进化的机会。这种可能性的出现,至少在地球上具有有利历史条件的一个部分,是进化的客观趋势的结果。而利用这种机会则是一个实际问题,并且得不到客观环境本身的任何保证。

我们仅仅简略地叙述了这种人类学和哲学—历史学的概念。因为我们还没有机会说明这一概念的全部变异或其相互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它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抽象些。但这不应使我们离开实质问题。恰恰是这种产生于解冻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抽象本质,使它能够对苏联模式的社会进行比较激进的批判。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种抽象本质摒弃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种中的替代论。在解冻的马克思主义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替代论的痕迹:国家机构和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和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或者,用解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

法,为了“人民”或“人”的利益)来管理社会,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则取决于领导的正确性。但是,从实践哲学的观点看来,一个社会只有由“人”自己来管理,才是社会主义的。除了“人”以外,没有人再谈论其他任何事情,这并非偶然。大量借用马克思青年时期和二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著作的东欧的实践哲学,在这一点上是解冻的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从阶级观点来看,实践的主体是不明确的。

解冻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遍的人道主义热情,产生于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应和对刚刚摆脱了系统恐怖的社会尚未显出差别的形形色色的希望。但是,当实践哲学从解冻的马克思主义中脱壳而出时,这些动力就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力量。在巩固“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体制时,批判的对象——为恐怖服务的意识形态被遗忘了。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被正式摒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头禅也不再提了,苏维埃国家被宣布为“全民国家”。最后,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再提及哪怕是间接地使人联想起恐怖时期的词汇。留给官方意识形态的仅有的积极的职能,就是象征性地代表政权机构的连续性。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起的全是消极作用:掩盖了社会的阶级结构,阻止对政权的性质、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缺乏个人的和集体的自由进行公开的、批判性的阶级分析。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政权当中,“人”本身的诸种希望也显示了差别: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找到了根据各自处境利用新制度所提供的机会的路子。这些集团的抱负在哲学上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协调起来,有时还是完全抵触的。

统治阶级中曾经领导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变革的那些阶

层,在为废除恐怖进行辩解时,不再操心提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当它们已经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时,批评已是过去的事。这时它们需要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同从“经典”著作中为解释苏联模式的社会寻求明确结论的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发生冲突。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他们自由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加强限制的美称。人们在这些限制之内做些事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逐渐放宽这些限制,但不能超越这些限制。经验表明,人们在这方面每一次表现出的主动性都招来把绳索拉得更紧的结果。那些勇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禁区的哲学家所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激进主义,只能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风险。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实践哲学和官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分歧同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在争取废除恐怖的斗争期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直接转化为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的抉择:解冻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道德角度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意味着长期动员状态的结束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斯大林分子提出的假黑格尔学派和假科学的宿命论,意味着回复到使用超经济力量和绝对贫困化。但是,在已经巩固了的斯大林主义之后的体制下,抉择已经不再如此简单、明确,人们不再能够把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同在哲学的抽象中采取的各种立场联系起来。即使工人阶级从实践哲学能得到某种启示,这种启示对它永远也不会起作用。由于情报的渠道和组织的大门再次被堵塞和关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所有交流再次成为不可能了。

实践哲学试图成为人的哲学,这里指的是所有的人,但当它定形时,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响应。统治阶级以镇压来回答激进的政治结论,哪怕这些结论都是抽象的东西。那些不屈从于统治阶级镇压的人,必须或者移居国外或者转入地下。但是,这次的政治挫折和理论失败将不会以全面毁灭告终,不会出现二十年代消灭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以后的那种情况。诚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受到很大削弱。但是,至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在地下状态下存在。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形势使离经叛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对苏联模式的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体制所抱的幻想在消失。同官方意识形态脱离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越来越不可能把开导和启发统治阶级任何一个集团作为它的实际任务。通常阻止人们按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的那些障碍正在消失。为马克思主义寻求自主的社会基础的这条道路已经打开。

当然,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找到它同工人阶级的实际联系,如果要通过运用它本身的理论手段来促进实际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有组织的并且具有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运动扩散到日益增加的大部分工人阶级中去,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仅仅放弃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是不够的。在社会体制方面,在工人阶级的处境方面,还必须发生这样的变化:统治阶级的权力机构不再强大到足以把工人阶级搞得支离破碎。直到这些变化可以被预见之前,同官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决裂的马克思主义才会有消失的危险,或者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下的意识形态中有消亡的危险,这种

地下意识形态更适合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与社会隔绝的状况。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至少没有陷入罗网——作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寄生虫而苟且偷生。